

明代石阡府的方志及其編纂： 兼論黔東地區府志的編刊歷程 *

唐立宗^{**}

明代黔東長期行政建置包括思南、銅仁、思州、石阡、鎮遠、黎平六府，全是貴州最先設府的所在地，關於這些地區的明代方志如今多已不存，故各界對纂修次數看法分歧。以石阡府為例，部分認知僅修一次，即成化志一部。或主張曾修過永樂志、成化志、隆慶志共三次；也有抱持明代當地志書全不可考的論點。經過本文的考訂，論證石阡地區的府志在永樂朝修過一部，成化朝修過兩部，隆慶朝一部，萬曆朝一部，合計明代總共五修，與銅仁府、黎平府志書數量相同。過去的誤解，連帶對纂修府志人員的事蹟所知甚少，史實應該修正。黔東地區僻遠，官員猶如流放，修志成為平日政務外的寄託，也可彰顯教化治績，這些當是志書刊行的要素之一。隨著地方開發與修志理念進展，黔東地區志書內容和體例更趨完備，修志者還重視經濟民生及地方邊防事務。本文就明代石阡府佚失府

* 本文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編號 MOST105-2410-H-260-012 之研究成果，初稿於 2018 年 8 月 16-19 日在貴州安順舉辦的「第十九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撰寫期間，曾獲香港中文大學卜永堅教授多次鼎力支持，並提供該校圖書館藏有的《貴州地方志考稿》一書參考。最後，審查意見的鞭策與激勵，得以讓本文再創生，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通訊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志數量重新辯證，考訂參與修志成員及相關史實，兼論黔東地區的府志發展，歸結其修志歷程。

關鍵詞：明朝、貴州、石阡府、地方志

一、前言

地方志的纂修淵遠流長，因涵蓋資治、存史與教化等功能，具有高度的工具性、實用性，故在傳統時代常被官方所重視。到了明代，方志的纂修進入興盛時期，與前代相比，修志風氣大增，不僅志書的數量可觀，種類形式與書寫風格也產生許多變化，於是明代志書編纂概況頗受學界的關注，出現考訂存佚的調查專著，以利學人深入科研。¹甚者嘗試將明代政區方志叢書出版排序目錄，力求一目了然，方便取捨，目的是對明代方志使用提供一定的便利。²

明代志書數量雖增，卻也佚失甚快。有關明代修志數量，早先在上世紀時，朱士嘉發表〈中國地方志統計表〉作了初步統計。³約過半個世紀，巴兆祥藉〈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指出有 2,892 種，其研究成果被不少論著所認可引用。⁴他繼之對佚失志書作表統計，估出明佚志約為明現存志書的 1 倍，占所有明代方志 65%。⁵對此，張升利用《文淵閣書目》、《永樂大典》來考察明初方志數量，聲稱巴兆祥對正統以前所修的方志數嚴重低估。⁶張新民也對

¹ 林平、張紀亮編纂，《明代方志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又如山根幸夫就日本所藏明代志書整理，進而出版傳記索引，山根幸夫，《日本現存明代地方志目錄》（東京：明代史研究室，1962）、《日本現存明代地方志傳記索引稿》（東京：明代史研究室，1964）。而 Jae-Hyon Byon 針對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等西南地區的現存志書，則有編目可供讀者索驥。《Local Gazetteers of Southwest China: A Handbook》（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9）。

² 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附錄：叢書影印明代政區方志初錄〉，頁 223-267。

³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統計表〉，《史學年報》，第 1 卷第 4 期（北平，1932.06），頁 171-173。

⁴ 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文獻》，總第 37 期（北京，1988.07），頁 152-162。

⁵ 巴兆祥，〈明代佚志述略〉，《文獻》，總第 46 期（北京，1990.10），頁 126-135、61。

⁶ 張升，〈明代方志數質疑〉，《中國地方志》，第 3 期（北京，2000.03），頁 64-67。

明代貴州佚志書的統計有所質疑，表示貴州佚志數字是不準確的。⁷其後，巴兆祥重新檢視文獻與參考新近學術成果，修正了看法，提出明代修志約 3,470 種，流傳存志僅約 1,014 種，即已佚志書約為現存志書的 2 倍，是全部明代方志的 71%，並強調這仍是不完全的統計，作較全面的統計非常困難，需隨時間推移、研究的深入，才會越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⁸

至今學界對於明代存佚志書的討論仍方興未艾，戴思哲(Joseph R. Dennis)認為明代方志數量還當包括稿抄本、私修等志書，這些未正式出版品最容易被遺忘，其總數量遠超過巴兆祥的統計。⁹再以省志為例，吳德義檢視存佚省志，指出明代西南地區的編修最為頻繁，與王朝政策發展有緊密關聯。¹⁰其中貴州地方志討論受到相當的關注，成果頗為紮實。例如張新民的《貴州地方志考稿》即搜輯匯考自宋至民國 400 餘部貴州地方志乘，評者論其書有：填補空白、著錄全面、考證精當、史料豐富、論斷允洽等特點。¹¹張明即在該書的基礎上，彙編〈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年表〉，考證出明代貴州志書至少有 74 部，現今只保存 10 部。可見明代貴州方志亡佚十分嚴重，導致後世學者知之不多。¹²張英聘則就明代貴州省志的多次編修分析，指出除官修外，還有私人撰述，各部省志有延續性的傳承。¹³

貴州，戰國時屬楚黔中地，又稱為黔。在歷史發展中，經歷過蠻荒到羈縻。到了明代，是中央王朝十三行省中最後納入行政區劃的建置，不論是《大

⁷ 張新民，〈明代貴州方志數量辨誤〉，《文獻》，總第 59 期(北京，1994.01)，頁 173。

⁸ 巴兆祥，〈論明代的方志數量與修志制度——兼答張升《明代地方志質疑》〉，《中國地方志》，第 4 期(北京，2004.04)，頁 45-51。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 70-82。

⁹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0.

¹⁰ 吳德義，〈明代存佚省志的數量與時空分布〉，《西北師大學報》，第 55 卷第 4 期(蘭州，2018.07)，頁 82-90。

¹¹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Gent: State University Ghent, Dept. East-Asia Sec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92)。張聞玉，〈《貴州地方志考稿》評介〉，《中國地方志》，第 5 期(北京，1994.10)，頁 63-66。

¹² 張明，〈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收入《人文世界：區域·傳統·文化》，第 7 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頁 159-182。

¹³ 張英聘，〈現存明代貴州省志編修簡述〉，《史志學刊》，總第 24 期(太原，2018.12)，頁 55-61。

明一統志》、《大明會典》等官修典籍，貴州書寫總在最末，置於帝國版圖的尾端，僅在「外夷」之前，代表中央與地方的距離，隱含著夷方荒地的理解。貴州提學副使謝東山(1502-1586)就說：「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貴州為最後，蓋其地荒僻且狹小也。」¹⁴在明朝統治下的貴州，受限於地理格局，交通困難，地貧物瘠，土著民族與移入軍民糾紛不止，身為貴州新添衛人的邱禾實(1570-1614)才會稱：「黔處楚、蜀、滇雲中，纔通鳥道，東西經長，南北緯狹。獠夷煽虐，漢戍晨星，田在草間，行商裹足。計土之入，曾不足供大國一朝之費。」¹⁵後來《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所著錄的明代方志文獻，貴州地方志的作品同樣列於卷末，延續著錄即為邊政書目，乍看貴州方志猶似全國文化與社會資源的終點站。¹⁶但是，貴州志書潛藏著大量邊地與族群資訊，又包含中央教化的治理環節，如何看待和定位明代貴州的地方志書，就成為別具意義的討論。¹⁷

不過，至今貴州志書研究也不免留下一些可待補足之處。諸如前人對志書的數量調查，除了探索存世方志外，多是依賴目錄類或總目提要等書籍，也有的是透過地方志書中的序跋追索軌跡，卻較少從明人文集中的撰述作相關旁證。¹⁸因此當筆者翻閱明人丘禾實的詩文作品——《循陔園集》，發現

¹⁴ 謝東山，〈送李涵入覲序〉，載於謝東山、張道纂修，〔嘉靖〕《貴州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 19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影印，1996），卷 11，〈藝文〉，頁 387。

¹⁵ 丘禾實，《循陔園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1，〈胡瑞芝中丞撫黔考績序〉，頁 10a。

¹⁶ 黃虞稷，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7，〈地理中〉，頁 204。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第 5 刷），卷 97，〈志第七十三·藝文二·地理類〉，頁 2415。

¹⁷ 張新民，〈大一統衝動與地方文化意識的覺醒——明代貴州方志成就探析〉，《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北京，2002.11），頁 35-43。

¹⁸ 因此諸如戴思哲的著述另闢蹊徑，不僅利用諸多的地方志書序跋，還透過志書編纂作者的詩文集作品來入手，進而討論地方志編纂的動因、出版過程與閱讀使用。參見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有幾篇志書序文，如〈黔記序〉、〈石阡府志序〉，都是萬曆年間的作品，可再追蹤。迄今學界無人知悉萬曆《石阡府志》的纂修情形，甚至對明代石阡地區志書的纂修人員、纂修次數了解也不夠深入。

再者，過去研究多集中於省志，對於省志以下的府州縣衛所等層級志書，關注零星分散，未能思索除了省志之外，其實各地方志書的纂修編刊，常反映地方社會的脈動，各地修志也都會有連動效應，並記錄共同關心的地方問題。以石阡府而論，若明代貴州是全國偏遠之境，地處貴州東北部的石阡府境可謂邊陲中的邊陲。時人也稱：「惟貴陽，古羅施鬼國，錯夷而治，山箐峭深；而石阡復界鎮、箐、西、播之交，接壤異省，其俗椎獷，其土瘠薄，其所轄四土司羈縻之境，蓋未可與中華聲教之國同日而語也。」¹⁹這裡的歷史書寫、志書作用，最令人好奇。雖然現有文獻不足，無法完整呈現石阡志書所能發揮的政治與文化統合作用，然則以區域社會有機體的互動思考，已有研究試圖歸結明清貴州部分區域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規律與橫向聯繫。²⁰同理將視角延伸到明代石阡周邊地區的志書互相參證，應可觀察出黔東地區地方官民的修志態度，豐富對王朝伸展治理的研究視野。

貴州個別志書流傳不廣，過去罕見又不夠重視，像是萬曆《銅仁府志》直到上世紀末影印出版後，學界漸注意到原來明代《銅仁府志》不止三修，甚至四修、五修。²¹而胡宗虞的《黎平府志》究竟是明末所修，抑或入清為之？何者為確？論者以為尚無旁證可定。²²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應該可以整體概括來討論闡釋。所以本文首先將對明代《石阡府志》歷次參與的纂修人員，作逐一清查與考證，多元運用不同的史料文獻比對，澄清一些誤解。

¹⁹ 龔勉，《尚友堂文集》（東京：高橋寫真會社，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十九年刊本影印，1977），卷1，〈送民部袁近沙擢守石阡序〉，頁40b。

²⁰ 高應達，《明清時代改土歸流後黔中少數民族區域社會的變遷：以黔東及黔東北地區宗族為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李錦偉、高應達，《明清時期武陵山區經濟與社會發展史論：以黔東地區為中心》（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王雨容，《明清黔東南書院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7）。

²¹ 張新民，〈萬曆《銅仁府志》點校本序〉，《西南古籍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頁99-101；胡振，〈萬曆《銅仁府志》作者考辨及體例與價值探究〉，《懷化學院學報》，第35卷第3期（懷化，2016.03），頁1-4。

²²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459。

其次，擴大地域範圍，歷時性探討僻地主動修志種種原因和成果。最後，探索志書撰作的實際應用面，利用現存志書以反映明代黔東地區的地方事務，期以更貼近歷史真相。

二、黔東地區的首創府志

明永樂十一年(1413)二月，朝廷新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轄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共八府，置官分職，正式統轄治理。空間結構上，這八府都位於黔東地區，象徵王朝政令之管控範圍，以流官解決原先地方的土司爭端問題；而黔中與黔西地區則多倚靠軍事衛所建置，或設軍民府，長官為土官，有別於黔東。²³明代貴州東西兩地軍事政區建置差異甚大，故時人體認到：「迤東諸郡則無兵可守，迤西諸州則無兵可親。」²⁴(參見附圖 1)

²³ 要強調的是，新化府於宣德九年十一月撤併入黎平府，烏羅府則在正統三年五月被撤併入銅仁與思南府；而黎平府僅在萬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暫隸湖廣，不到兩年又歸屬貴州。所以明中期後，黔東地區長期維持六府的行政建置。

²⁴ [嘉靖]《貴州通志》，卷 1，〈建置沿革〉，頁 20。



附圖 1：明成化元年(1465)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圖。

資料來源：寧南左侯繪，《明代歷史行政地圖冊》(編者自印出版，2018)。

在此前一年，朝廷已頒布〈修志凡例〉準則，規定各地志書的編寫原則。到了永樂十六年(1418)，再次頒布全國〈修志凡例〉，詔修天下郡縣志書，命戶部尚書夏原吉(1366-1430)、翰林學士金幼孜(1368-1432)與楊榮(1371-1440)同任總裁官，下令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²⁵修志目的表明為了要「貽謀子孫，以嘉惠天下」。於是大張旗鼓，「遂遣使徧采天下郡

²⁵ 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卷 201，「永樂十六年六月乙酉」條，頁 2089。

邑圖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²⁶全國修志存有帝王好大喜功，可彰顯文治一統等種種意圖，而貴州更是初入版圖，最具有指標意義，陸續有官員採錄文獻，遵行修志體例，完成志書。²⁷諸如永樂十五年(1417)的《思州府志》、永樂十六年(1418)的《普安州志》，均在此一環節下纂定成書。²⁸

石阡府自不例外，《明代方志考》一書提及有明一代，貴州石阡地區僅出現成化《石阡府志》十卷，不過另有學人考證舉列，早在永樂年間，除了思州府、普安州兩地外，銅仁、思南、石阡、鎮遠諸府均有志書。²⁹再經由明人楊士奇(1365-1444)整理的《文淵閣書目》，可知在正統六年(1441)前，貴州八府中至少七府完成志書，即使是後來被裁併的新化、烏羅兩府也都有府志。³⁰短短數年各府均落實志書編纂任務，可謂是極高效率，驗證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是這些志書的纂修者是誰？確實難已稽考。因此《貴州地方志考稿》指出《石阡府志》當纂於永樂置府以後，正統以前，纂者不詳。³¹

然而，從談遷(1594-1658)《國榷》的紀錄觀察到，朝廷對於初入版圖的貴州治理是高度重視，首任地方官即以「進士新建崔彥俊為思州知府，江陰顏澤為鎮遠知府，貴溪李鑑為石阡知府」。其中「彥俊任十八年，澤十四年，

²⁶ 陳文等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卷 327，「天順五年四月乙酉」條，頁 6741。

²⁷ 早在洪武十五年，初步平定雲南後，朱元璋即命儒臣考按圖籍及前代所有志書編寫《雲南志書》61 卷，以供王朝中央參考。其書討論見王叔武，《雲南古佚書鈔(增訂本)》(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 76-77。所以，永樂年間的貴州修志情形，與洪武年間雲南修志相類。

²⁸ 張新民，〈地方性知識的文本世界——貴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論〉，《貴州民族研究》，第 2 期(貴陽，2007.04)，頁 166。

²⁹ 林平、張紀亮編纂，《明代方志考》，頁 416；張明，〈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頁 161-162。但〈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將《銅仁府志》纂修時間列於永樂十一年，應該有誤。

³⁰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75 冊，卷 4，〈新志〉，頁 230。

³¹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 552。

鑑九年」，在官員的久任治理下，「夷習丕變」。³²這些派駐官員既是能臣，又受朝廷信賴，會高度貫徹朝廷意志，所以思州府首任知府崔彥俊特奉詔令，與教官「照依凡例，採纂照冊完備」，完成志書。³³由此推論，永樂年間調派久任的貴州各地知府，極可能都配合當局意志，認真參與過自己轄區的府志纂修活動。³⁴就石阡府而言，首任知府李鑑為永樂四年(1406)丙戌科第三甲進士，到任後，「創制立法，導民變俗」，被著錄志書中的〈名宦〉。³⁵他在石阡任官長達九年，離任時已近永樂末期，最有可能就是永樂《石阡府志》的關鍵推手。

此外，地方儒學是方志編纂的又一主要力量，教官、生員參與修志均為朝廷推行教化重要途徑。³⁶石阡府設有教授一人，從九品，月課士子藝業，永樂十三年(1415)，首任教授廣東揭陽人吳衡到任，「時初設學，衡能振起文教，誘掖士類」，更重要的是，他在石阡地區任職長達二十年之久。³⁷雖然永樂《石阡府志》今已無存，但貴州現存最早的方志——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六〈石阡府〉中，還可看到吳衡對石阡的知府山、排衙山、魚子孔泉等三首吟詠詩作。³⁸

³² 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5，「成祖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亥」條，頁1087-1088。

³³ 郭子章，〔萬曆〕《黔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4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刻本影印，1988)，卷40，〈宦賢列傳·思州知府崔彥俊〉，頁791。

³⁴ 類似的情況可見江西《浮梁縣志》、《饒州府志》的例子，當時朝廷「爰命儒臣駐節各郡，廣延儒士」修志，地方「恪遵上命，夙夜於公，不敢小怠」。志書即以正堂長官知縣或知府主修，儒學教官協助編輯校讎。參見鄭克強總主編，易平主編，《贛文化通典·方志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67、226-227。

³⁵ 沈庠修，趙瓚纂，〔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199》(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刻本、配明鈔本影印，2006)，卷6，〈石阡府·名宦〉，頁71。

³⁶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33。

³⁷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6，〈石阡府·名宦〉，頁71。

³⁸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6，〈石阡府·山川〉，頁65-66。

三、知府余志與成化《石阡府志》

關於明代《石阡府志》，近人《明代方志考》一書僅列舉成化《石阡府志》十卷，纂修者祁順(1434-1497)，現已佚失。³⁹根據《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的編目，均能找到是志，只是無法確認版本。在清初，石阡本地已難尋覓，康熙初年地方官表示：「緬維昔志之修，率舉郡典所有，相沿數百年，後寢失其傳。」⁴⁰可見清初已難曉明志內容，遑論知悉參與過的編寫者。

目前提及石阡志書的討論，一致指出成化《石阡府志》的作者是祁順，卻忽略祁順在重修志序中的一段話：

郡昔有志，失之太略。成化庚子，前守余君重脩一帙，比舊為詳，然篇章錯雜，文字細碎，亦有可書不書，不當錄而錄者。夫記載不明，曷以傳遠？順為是慮，乃因余君舊志再加脩纂，芟繁撮要，正謬補遺，庚子而後有可采者，次第增入，於是一邦事實，粲然備具，可以聞於四方，可以信於後世，無復昔時之湮晦矣。⁴¹

此處提到「郡昔有志，失之太略」，是對永樂舊志過於簡略的批評。「前守余君」，則是指成化十五年(1479)到任的知府余志(1419-?)。庚子年即成化十六年(1480)，余志有感於舊志疏失，加以增補重修，因此「比舊為詳」。數年後，祁順對於余志編纂的志書也有意見，認為過於錯雜瑣碎，興起了再修的念頭，並增補前志闕漏的記載，期以編出一部燦然備具、流芳後世的地方信史。由此可見，在祁順編纂的志書之前，還有余志編修的《石阡府志》。

³⁹ 林平、張紀亮編纂，《明代方志考》，頁416。

⁴⁰ 劉啟復，〈總論〉，載於羅文思纂修，〔乾隆〕《石阡府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貴州府州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據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影印，2001)第1冊，頁293。

⁴¹ 祁順，《巽川祁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3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康熙二年在茲堂刻本影印，1997)，卷11，〈重脩石阡府志序〉，頁525。

余志，福建建寧縣人，字志學，天順八年(1464)甲申科進士。個性耿介，因故貶官任廣州府通判，任上清理戶口，丈量田土，安輯流民，考滿「陞知石阡府，夷民安之」。在偏鄉任官，讓他認清到仕途坎坷，遂乞致仕，歸鄉建書堂於所居後山，匾曰「休谷」，另一曰「優游」，笑詠其中以自樂，有《橋門》、《秋臺》等集藏於家。⁴²

余志在石阡曾留下諸多詩文，多為通志所採擇。如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收錄余志對於石阡獅子山、馬鞍山、寒林簫的賦詩，文章則有〈板橋重建記〉，其後亦錄入在嘉靖《貴州通志》內。⁴³該注意的是余志為前知府胡信(?-1449)所作的傳記，在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有提到「詳見知府余志所作傳」，可是弘治志書中卻找不到詳傳記載。⁴⁴倒是萬曆《貴州通志》收錄余志的〈胡知府死節傳〉與〈王烈女傳〉全文，顯示萬曆年間尚能尋得余志的作品。耐人尋味的是「余志」書寫成「余忠」，容易混淆我們對余志作品與撰修志書的認識。⁴⁵

石阡府儒學教授王宣清或也參與過《石阡府志》的纂修。王宣清，江西泰和人，有一詩詠錄入在弘治《貴州圖經新志》。⁴⁶多數志書對他何時在石阡擔任教授是語焉不詳，王宣清本人倒有撰寫過頌揚知府余志捐俸修建府治譙樓的專文，當中就說：「成化乙未冬，余承乏石阡教事。」即表明他在成化十三年(1477)到任。此篇專文大力推崇余志善政，希冀流傳後世：「〔宣〕清忝以文字為職業，敢不因侯之實蹟而記之，以示于後乎！」⁴⁷被收於省志，正好凸顯志書是最合適的宣傳平台，可作為永垂不朽的宣教載體。另有一例，

⁴² 何孟倫輯，〔嘉靖〕《建寧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38》(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卷 7，〈人物志〉，頁 701-703。

⁴³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 6，〈石阡府·山川〉，頁 65-66；〔嘉靖〕《貴州通志》，卷 2，〈山川·石阡府〉，頁 61。

⁴⁴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 6，〈石阡府·名宦〉，頁 71。

⁴⁵ 王未賢、許一德纂修，〔萬曆〕《貴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卷 23，〈藝文志三〉，頁 569-570。此外，〔萬曆〕《黔記》，卷 10，〈山水志下〉也收入余志一些詩文。

⁴⁶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 6，〈石阡府·山川〉，頁 65。

⁴⁷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 6，〈石阡府·宮室〉，頁 68。

王宣清還京請過銅仁知府周銓(1429-?)為余志重修文廟作記，用意相同：「是宜誦禱以為美談，又當書之以告于後世。」⁴⁸

四、知府祁順與成化重修《石阡府志》

前引文已說明，知府祁順「因余君舊志再加脩纂，芟繁撮要，正謬補遺」，將成化十六年(1480)之後的紀事一一編入新志內，冀望再現信史。祁順之名長久以來湮沒不彰，曾有學者表示相關研究寥寥。⁴⁹祁順，廣東東莞人，字致和，號巽川先生，天順四年(1460)庚辰科進士，曾陞至江西左參政，命未下，即坐事誅謫，降調貴州石阡知府。這裡要提醒的是，朝廷發佈貶官的時間在成化十八年(1482)五月，⁵⁰祁順曾自稱該年：「予自江右藩司來知石阡府事。」實際上他到隔年年初才正式到任，故又云：「成化癸卯春，余知石阡郡事。」⁵¹成化癸卯年，正是成化十九年(1483)。所以過往學者提出成化十七年(1481)、十八年(1482)貶官到任的說法，應作修正。再者，有論者指出祁順在弘治五年(1492)，因母喪歸東莞，六年(1493)服闋，也是誤解。⁵²因為祁順自己曾述及弘治二年(1489)四月，「余守制南還」。⁵³丁憂三年後，弘治五年(1492)服闋方為合理。換言之，從成化十九年(1483)到弘治二年(1489)間，祁順任石阡知府的時間是歷經六載。

⁴⁸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6，〈石阡府·祠廟〉，頁69。

⁴⁹ 廖肇亨，〈明代朝鮮詔使詩世界觀探析：以祁順為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218期(成都，2018.11)，頁168。

⁵⁰ 劉吉等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卷227，「成化十八年五月壬午」條，頁3890。

⁵¹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11，〈送致政曾經府序〉，頁521；卷12，〈宦適軒記〉，頁532。

⁵²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552-553；溫建明，〈祁順及其《巽川祁先生文集》研究〉，《東莞理工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東莞，2013.08)，頁9。

⁵³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16，〈雜志〉，頁576。

石阡僻遠，本地人稱「郡界在夜郎、邛笮間，其民夷也，其俗陋也」，意指石阡位於西南蠻夷古國境內。⁵⁴祁順初到任，有感於「石阡僻陋，安於夷俗」，欲興化禮教，取代流俗，「乃設館穀，集儒生，暇則親為講授」，地方文治果然大為提升，「未數載，郡擢科第數人」。祁順還在石阡「謹斥堠，開屯田，廣儲蓄，招流移，大為郡人所利賴」。⁵⁵居官至第五年，頗有治聲，上級長官咸以為他在此久淹，深感可惜。祁順不以為意，恬然自適，以歐陽脩(1007-1072)詩自勉，「則吾之久此，亦足為樂也」。⁵⁶祁順深受百姓愛戴，離任時，士民「競解公衣帶，以志去思」。⁵⁷

祁順何時完成《石阡府志》呢？根據〈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的整理，纂修時間列於成化十八年(1482)。⁵⁸可是這與若干紀錄牴牾，祁順是成化十九年(1483)初到任，無法在到任前就纂修志書。祁順好友周瑛(1430-1518)撰述過〈重修石阡府志序〉，他說：「公來輯和夷夏，宣布德澤，修舉廢墜，不一二年，政通民懷，乃以餘力周旋文事，以為郡之有志，係一郡之體統，郡志不修，何以示天下、傳後世？」顯示志書必然是祁順到任數年後才開始纂修。周瑛還提到志書成稿，自己正從江西撫州「改知鎮遠」，祁順藉以邀請撰序。⁵⁹周瑛是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奉命調任鎮遠知府，可推定志書至遲當是該年之前完成。

弘治元年(1488)年底，祁順移家「出寓鎮遠」，兩人常相見，時而詩文唱和，到了隔年春天又相偕奉命入省城纂修《實錄》。⁶⁰祁順在貴州石阡居官算來已是六年，頗有感懷，故給周瑛題詩：「作郡無能忽六朞，公家移檄費驅馳。江山助我詩何補，日月催人老不知。」⁶¹也恰好是這第六年，祁順守

⁵⁴ 劉球，《兩谿文集》，收入《明別集叢刊》(合肥：黃山書社，據明成化六年劉鉞刻本影印，2013)第1輯第38冊，卷14，〈送石阡推官康公復任序〉，頁441。

⁵⁵ 徐兆魁，〈江西布政使巽川祁公傳〉，收入《巽川祁先生集》，頁404。

⁵⁶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16，〈雜志〉，頁575。

⁵⁷ 徐兆魁，〈江西布政使巽川祁公傳〉，收入《巽川祁先生集》，頁404。

⁵⁸ 張明，〈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頁162。

⁵⁹ 周瑛，《翠渠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54冊，卷2，〈重修石阡府志序〉，頁755。

⁶⁰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12，〈遊鐵溪記〉，頁533。祁順提到：「弘治戊申冬，余自石阡出寓鎮遠，時周君梁石實守茲郡。己酉春正月，偕至貴陽纂脩而還。」

⁶¹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6，〈途中東翠渠〉，頁464。

制歸鄉，陳獻章(1428-1500)向祁順致詩：「六年飽讀石阡書，習氣而今想破除。」⁶²是否陳獻章也閱讀到祁順主修的志書呢？證據雖不夠充分，至少意味著讀過祁順的著作。

石阡地僻事簡，「日日看山退食遲，滿庭芳草客來稀」，⁶³祁順得以專注地方文獻的補遺工作。他批評前志龐雜不類，因而「別為義例，重加採輯，繁亂以刪，譌謬以正，脫略以補，間有後人所當紹述者，則引其端，以待諸後」。書成，共十卷，還附輯錄全府各處長官司的紀錄，「司志隸焉」。⁶⁴其體例應是遵照《大明一統志》要求的府州縣為次序，包含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因此長官司紀錄置後。

祁順對志書有很深刻的期許，他說：「文物關乎世運，志載繫乎風教，尚願同志君子相繼脩輯，俾之愈傳愈遠，而愈不窮，是亦為政之當務也。」⁶⁵此時輔佐他治理文教工作的是教授毛淵(1434-1506)，浙江蕭山人，成化六年(1470)拔貢生，先授山東城武縣學教諭，繼陞石阡府學教授。⁶⁶毛淵曾特請貴州按察司僉事周孟中(1437-1502)為府學重建事表彰祁順功績，該文收錄於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或也可能是先收於府志，再被省志參酌補入。⁶⁷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對祁順及其志書評語：「改任知府，才智豐敏，有守有為，嘗著《石阡府志》十卷，及他制作，皆偉麗，為時重。」⁶⁸至清代，地方官蒐羅舊志，卻只能找到祁順的一首五言律詩，其它包括余志等著

⁶² 陳獻章，孫通海點校，《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下冊，卷6，〈答石阡太守祁致和〉，頁636。

⁶³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7，〈石阡小詠二首〉，頁477。

⁶⁴ 周瑛，《翠渠摘稿》，卷2，〈重修石阡府志序〉，頁755。

⁶⁵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11，〈重脩石阡府志序〉，頁525。

⁶⁶ 毛淵小傳可見毛黼亭纂修，《蕭山毛氏宗譜》(美國猶他州學會，據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攝影)，卷4，〈行傳·大房世系紀〉，頁2a。

⁶⁷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6，〈石阡府·學校〉，頁67-68。

⁶⁸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6，〈石阡府·名宦〉，頁71。

作僅存篇名，遂稱：「皆關風化，有光郡志，今俱遺失，可惜。」⁶⁹所幸祁順的詩文集作品仍存於世，詩文集集中的〈重脩石阡府志序〉、〈石阡府題名記〉、〈石阡府脩倉記〉、〈石阡科舉題名記〉、〈石阡府學歲貢題名碑〉、〈重修石阡府城隍廟碑〉，均成為考證石阡明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遊記詩文也刻劃石阡風光，大有價值。⁷⁰

五、知府李兗(呂兗)與隆慶《石阡府志》

隆慶《石阡府志》早已失傳，殘留的吉光片羽，現僅能仰賴郭子章(1542-1618)《黔記》收錄的略序，當中提到志書共十三卷，是知府餘姚人李兗(1538-1597)所撰，其〈自序〉略文云：

隆慶己巳，府推[官]王君署府事，以暇日求府之圖籍，閱之，得一寫本，昉于成化初，大抵潦略舛謬，文俚而不雅，事雜而無敘。君竊病之，乃命府學教授吳、馮二子，相與博采羣蒐，將掇拾而成稿。兗適以是夏來蒞府事，王君輒以志屬兗重加刪訂，俾有所是正而可傳焉。兗愧不文，敢與史訓？然而圖籍，邦政也，不可以辭，乃悉加繙繹而詮次之。書之為圖者一，為志者十，誥敕之附者一，詩文之附者一，總之為卷者十三，彪分眡列，亦頗詳整而刻成矣。⁷¹

隆慶己巳是隆慶三年(1569)，這段略序反映志書重修起因在於代理知府欲知政事，對於成化年間纂修的府志仍感缺憾。對比相關材料，我們可以找出當時代理知府是推官王朝用，雲南曲靖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舉人，在隆慶二年至三年間(1568-1569)，曾依次重建府治內的養濟院、社倉。⁷²王朝用有心改善舊志潦略舛謬、文俚不雅、事雜無敘的弊病，故找來時任府學教授吳從臯(四川松潘人)、馮晉(四川南部人)共同釐訂石阡志稿。到了該年夏季，再轉交新任知府重新刪改校訂，內容則是加強了輿圖、誥敕與詩文等類目。由

⁶⁹ [乾隆]《石阡府志》，卷6，〈學校志·名宦〉，頁351。

⁷⁰ 溫建明，〈祁順及其《巽川祁先生文集》研究〉，頁12-13。

⁷¹ [萬曆]《黔記》，卷14，〈藝文志上〉，頁301。

⁷² [萬曆]《黔記》，卷24，〈公署志下〉，頁520。

附添朝廷獎勵的誥敕來看，代表地方人士任官者漸增，又可攬絡地方名望、土官勢力，均有其深遠意涵。

前次《石阡府志》約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纂修，距隆慶三年(1569)已過八十餘年，地方人物、事蹟屢有變遷，理應增補，石阡府城自嘉靖元年(1522)首次築城，再過四十年「始甃以石城」。⁷³此等要事最當列入志書記錄。目前無法實證隆慶《石阡府志》增補了哪些內容，好在還能尋得知府李兗對築城與地方治理重視紀錄：

李兗，餘姚人，由官生，隆慶三年知石阡，下車見蕭、王二守所創城，甚喜。頽潰者，修之；樓弗輯，捐資構之，若相濟焉者。……憫民田不均，建議丈量，與推官王朝用協心任之，尋墾履畝，勞形焦思，按數稽弓。於是山塢溪澗之田欺隱者，悉皆丈出，糧差頓減，一洗宿弊，豪強或憾之，而小民咸頌。⁷⁴

其政績因此被著錄在志書內，後來乾隆志書有云：「皆志載。」並對李兗主修的地方志亡佚感到惋惜，嘆曰：「然隆慶時已多散失矣，奈何！」⁷⁵其實，在萬曆年間，時人仍可閱讀隆慶《石阡府志》，故《黔記》會收錄序文，並給予李兗「暇脩郡志，秩然有餘」的評價。⁷⁶

我們還可留意知府李兗的姓氏，貴州的地方志書均稱知府李兗，然在浙江餘姚，當地李氏家族已經對外宣稱改姓。李兗父親李本(1504-1587)曾任大學士，退休九年後，為了加強地方社會的宗族力量，於隆慶四年(1570)奏疏復姓，獲得朝廷的同意。⁷⁷所以李兗又為呂兗，餘姚地方家譜、文獻只能採得呂兗

⁷³ [萬曆]《黔記》，卷5，〈輿圖志二〉，頁128。另有一說：「府無舊城，正德五年始築土城，嘉靖初建三門，城周三里有奇。」見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22，〈貴州三〉，頁5326。

⁷⁴ [萬曆]《黔記》，卷40，〈宦賢列傳七〉，頁812。

⁷⁵ [乾隆]《石阡府志》，卷6，〈學校志·名宦〉，頁352。

⁷⁶ [萬曆]《黔記》，卷40，〈宦賢列傳七〉，頁812。

⁷⁷ 戴思哲，〈明代大學士李本為什麼退休後改姓呂——呂府與呂家史〉，《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0卷(天津，2009.10)，頁57-64。

的記載，沒有李兗的紀錄。有意思的是，由於《石阡府志》是在隆慶三年(1569)成書，當時李兗尚未復姓，志書保留原姓，以致後來貴州志書依舊沿用李姓，如今各項研究看法一致，隆慶《石阡府志》的作者是李兗，卻未察覺作者也是呂兗。

呂兗，字東甫，號岱陽，浙江餘姚縣人，在山東兗州府濟寧州出生，因之得名。據說他「生而白皙，髮黑漆貌」，個性凝重，不好嬉戲。呂兗非科舉出身，而是以父蔭入太學，歷任後軍都督府都事、經歷，至隆慶初年改宗人府，均為閒職，並不在意，「夷曠自適，不碌碌逐時好」。擢為貴州石阡知府時，「襲舊為政」，「主在不擾俗，咸便之，夷種皆懷德焉」。三年後大計罷歸，不怨天尤人。⁷⁸石阡知府呂兗的事蹟，史料零星分散，故得仰賴明人文集、家譜等紀錄的蒐羅補充。

六、知府江大鯤與萬曆《石阡府志》

郭子章《黔記》是現存晚明貴州最後一部通志，資料豐富，體例完備，被譽為深具典範意味的私撰志書。⁷⁹萬曆三十一年(1603)，丘禾實欣然為《黔記》撰序，吐露原先有撰寫地方志的想法，出於鄉賢湮沒、舊志散漫磨滅難讀的動機，「夫其湮沒也，豈非無以表彰之；而其散漫磨滅且無乘也，又豈非黔士大夫之過也」。丘禾實「自以學閥典墳，搜羅未廣，俱為山川羞」，最終打消了為鄉里修志念頭。他樂見書成，讀後作序稱：「第余樂桑梓文獻有歸，且見君子之有益於人國如此。」⁸⁰事實上，他對《黔記》也略有失望，「所病黔荒初開，諸郡邑乘，什不一備」，感到仍不盡全。不久，「適石阡太守江君貽余郡志」，得到《石阡府志》後，喜愛讚賞，「因為君序」。⁸¹

⁷⁸ 孫鑛，《月峰先生居業次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萬曆四十年呂胤筠刻本影印，2000），卷5，〈石阡知府岱陽呂公暨配謝恭人合葬墓誌銘〉，頁293-294；並可參考張萍，《明代餘姚呂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41-42。

⁷⁹ 關於郭子章《黔記》，可參考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18-22的介紹。以及張英聘，〈現存明代貴州省志編修簡述〉，頁59-61。

⁸⁰ 丘禾實，《循陔園集》，卷4，〈黔記序〉，頁16b-17b。

⁸¹ 丘禾實，《循陔園集》，卷4，〈石阡府志序〉，頁2b-3a。

翻查相關志書，萬曆年間石阡知府江姓者共有兩名：一是江至道，山東朝城人，因父蔭而得官生，《黔記》記萬曆二十八年(1600)到任；⁸²另一為江大鯤(1556-?)，乾隆《石阡府志》記萬曆三十四年(1606)任職，江大鯤僚友余懋孳(1565-1617)的〈贈江君擢守石阡序〉，卻是撰於甲辰年，即萬曆三十二年(1604)已有職務異動消息。⁸³就時序上來判斷，萬曆《石阡府志》的編者無疑是江大鯤。因為丘禾實曾為江大鯤撰述過〈都轉運使江公大鯤三拜恩綸序〉，當中即表示：「余於公為莫逆交。」讚揚其政績：「故公之治石也，益以愷悌先明察，以禮樂代戈鋌。且為石蒐往驗來，遂成良史。」⁸⁴由蒐往驗來的治史描述，顯見江大鯤確實曾將《石阡府志》完稿與丘禾實分享，並邀請撰序。

江大鯤，字時化，號少溪，萬曆十三年(1585)乙酉科雲南舉人，父祖輩原居徽州府歙縣，其父江存惠(1513-1582)幕僚起家，隆慶二年(1568)調任雲南楚雄府呂合巡檢司巡檢，闔家遂遷居雲南。江大鯤歷任四川蓬溪縣教諭、陝西鳳縣知縣、大理寺右寺副、署左寺正，陞至貴州石阡府知府後，三年考滿，「郡稱上治」，即循例為父母取得封蔭。⁸⁵江大鯤勤於職事，最初將被派往石阡赴任時，有些人略感訝異：「以石阡遠在萬里外，華夷錯處，屬播事瘡痍之餘，民瘠吏勞，不足以優賢者。」余懋孳肯定江大鯤的才名與治行，相信他定能迎刃而解。⁸⁶另一名友人鮑應鰲(?-1622)更是期許鼓舞，贈序曰：「君

⁸² [萬曆]《黔記》，卷29，〈守令表〉，頁606。

⁸³ [乾隆]《石阡府志》，卷3，〈職官志·知府〉，頁321；余懋孳，《萇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99》(濟南：齊魯書社，據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影印)，卷1，〈贈江君擢守石阡序(甲辰)〉，頁496-497。

⁸⁴ 丘禾實，〈都轉運使江公大鯤三拜恩綸序〉，收入江上錦編輯，《新安東關繼陽江氏宗譜》(美國猶他州學會，據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攝影)，卷18，〈舊傳〉，頁19b。

⁸⁵ 江上錦編輯，《新安東關繼陽江氏宗譜》，卷7，〈彥政公世系〉，頁11a-b；卷15，〈明貴州石阡府知府江大鯤父母第三次〉，「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頁14a-15a。

⁸⁶ 余懋孳，《萇言》，卷1，〈贈江君擢守石阡序(甲辰)〉，頁497。

固通籍滇南，於黔為近，而其山川土風，謂君能習之。且也播酋煽虐之後，其鄰封接壤，尚多阨隍而不寧，又非君練習不可治；故用君守耳。」⁸⁷

在石阡，江大鯤建祭祀各壇廟，鑿南關外兩溫泉。⁸⁸他不負眾望，到任「延父老問疾苦，省刑薄斂，加意噢咻，不期月而郡大治」。面對播州之役後的山民餘亂事件，「運智設奇，談笑勘定」，撫按官均嘉歎。適貴州兵備道缺員，一致舉薦江大鯤，但吏部已先推陞他為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轉運使。在福建，江大鯤處理鹽政，實行開中派引，持廉秉正，「又慮後有紛更，復呈詳編入《運誌》，永著為例」。⁸⁹這部由江大鯤主修的《運誌》，全名就是《福建運司志》，並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刊印。⁹⁰正因為江大鯤曾陸續編纂《石阡府志》、《福建運司志》，所以江大鯤「自閩入覲，便道省墓」返回歙縣祭祖時，族人欲借重他的編纂經驗，相語曰：「子大夫有良史材，族故有譜，久而湮，湮而新之，舍子其誰任哉？」江大鯤推辭不過，即領銜主修《江氏宗譜》。⁹¹

江大鯤的萬曆《石阡府志》很少人知曉，如今僅能依賴丘禾實的〈石阡府志序〉推敲內容一二：

余嘉其體簡而盡，秩瞻而裁，鑑爽而當。嗟乎，使司黔者人人用心如君，黔不有全史耶？志載石阡二百年來，中經兵火，有臣死義，微志吾無從知之，即國史。他日志邊防、傳忠烈，微志亦無所取之。蓋余于石志而益見郡志之不可無，若此因為君序。⁹²

此時志書再經整理，體裁簡當得宜，強調兵防、忠烈等事蹟，應是昔日地方受到播州之役的影響，加上還有萬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間(1605-1606)發生的

⁸⁷ 鮑應鰲，《瑞芝山房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41》(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崇禎刻本影印，2000)，卷 5，〈贈寺正江君擢守石阡序〉，頁 124。

⁸⁸ 羅文思，〈黔紀紀要〉，收入〔乾隆〕《石阡府志》，頁 299。

⁸⁹ 林煙，〈送運長少溪江公入覲序〉，收入江上錦編輯，《新安東關繼陽江氏宗譜》，卷 18，〈舊傳〉，頁 21a-b。

⁹⁰ 江大鯤、林煙等修，《福建運司志》，收入《玄覽堂叢書·初輯 10-11》(臺北：正中書局，據明萬曆癸丑刊本重印，1981)。

⁹¹ 江大鯤，〈舊譜後序〉，收入江上錦編輯，《新安東關繼陽江氏宗譜》，卷 16，頁 13a。

⁹² 丘禾實，《循陔園集》，卷 4，〈石阡府志序〉，頁 3a。

平定東西二路「苗亂」戰事，志書或會著重相關的書寫，表揚殉難者的忠義。此外，我們從郭子章詩文中提及的「予將東歸，江石阡以八景求題」事，⁹³也可推想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貴州巡撫郭子章告病回籍，此刻江大鯤已進行府志的纂修工作。將本地八景收錄志書，央求上級長官題贈詩文，藉由名人詩賦，不僅添增些許風雅，還可用其名望來襯托地方的重要性。據《明神宗實錄》記載，江大鯤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由石阡知府升任福建副使。⁹⁴進一步研判，萬曆《石阡府志》的合理完成時間，當是在萬曆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607-1609)之間。

七、黔東地區的府志估算

除了明代《石阡府志》修纂次數該修正外，另可相提並論的為《銅仁府志》。長久以來，因萬曆《銅仁府志》極為罕見，過去僅能推論永樂朝一修，以及萬曆朝修過兩次。至萬曆《銅仁府志》影印出版後，近年才發現原來志書作者與明代府志數量應該重估。根據該志引述舊志，撰者評論：「按舊志，嘉靖四年間，郡人盧金、鄭重修，距今未久。」證實了嘉靖朝確有修志。⁹⁵要澄清的是，盧金與鄭重兩人時代不同，盧金為成化九年(1473)貢生，二十年(1484)任吳江縣丞，致仕返鄉後，「留心撰述，藩牆齋室，各置筆研，草《郡志》，凡若干卷」，其志因「考摭詳悉，後學倚為司南云」，被奉為圭臬。⁹⁶盧金的修志經驗源於吳江仕宦期間，他協助並捐俸，促成了弘治《吳

⁹³ 郭子章撰，郭子仁編，《青螺公遺書》(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冠朝三樂堂刊本)，卷33，〈詩·黔草〉，頁14a。

⁹⁴ 顧秉謙等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卷464，「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戊戌」條，頁8763。

⁹⁵ 陳以躍主修，萬士英主撰，〔萬曆〕《銅仁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後期刻本影印，1992)，卷3，〈食貨志·貢賦徭役附〉，頁144。

⁹⁶ 〔萬曆〕《銅仁府志》，卷9，〈人物志·鄉賢〉，頁211-212。

江縣志》的刊行。⁹⁷既然弘治初年盧金仍在吳江，則《銅仁府志》的修纂就當其後，不可能在此之前。至於鄭重是嘉靖四年(1525)舉人，為銅仁府首中科第者，他在該年修志六卷，稿藏於家。⁹⁸合理推測，鄭重所修的六卷志，即以盧金志書續之，《銅仁府志》於弘治至嘉靖朝都曾再修，有明一朝合計也有五修。

明代黔東地區，黎平府的方志數量頗有爭議。一來官方藏書《文淵閣書目》未錄《黎平府志》，彷彿明初黎平府未曾修志。二為貴州黎平部分地區隸屬湖廣都司，土司領地與府縣衛所間犬牙交錯，府衛糾紛時起，出現貴州、湖廣兩省邊界的改屬議論。⁹⁹部分著述或會著重地理沿革的書寫，譬如成化《黎平地理考》四卷、嘉靖《黎平五開記》八卷、萬曆《黎平地輿志》十二卷，這些作品能否視為府志？再則崇禎《黎平府志》的作者為誰？在在都影響吾人對明代當地方志數量的估算。

為解決上述疑難，可用史源學的方法入手，從景泰七年(1456)編修的《寰宇通志》，能看到當中引用兩處《郡志》記載。¹⁰⁰據天順五年(1461)修成的《大明一統志》，黎平府的風俗條目記：「其言駮舌，其性兇頑《郡志》；病惟祭鬼，占用雞骨《新志》。」以及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摘引《舊志》、《新志》若干，均揭示《黎平府志》在明初必有修志，且弘治朝前不止一修。¹⁰¹

其次，《黎平地理考》的作者留讓，於成化中任黎平府儒學教授，《黎平五開記》的作者馮天秩，則在嘉靖年間任黎平府推官，兩人都在黎平府內

⁹⁷ 孫顯，〈吳江志序〉，載於莫旦纂，〔弘治〕《吳江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4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弘治元年刊本影印，1983），頁3。關於弘治《吳江縣志》編刊，參見林麗月，〈從吳江到新昌——莫旦(1429-1510s)與明代前期的方志纂修〉，收入李金強、郭嘉輝，《從明清到近代——史料與課題》（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73-91。

⁹⁸ 〔萬曆〕《銅仁府志》，卷9，〈人物志·鄉賢〉，頁212。

⁹⁹ 吳春宏，〈明清時期黔楚邊境的府衛糾紛——以黎平府與五開衛為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6卷第2期（西安，2011.04），頁32-43。

¹⁰⁰ 陳循等撰，《寰宇通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景泰年間內府刊初印本），卷114，〈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黎平府〉，頁12a-b。

¹⁰¹ 李賢等修，萬安等纂，《大明一統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天順五年內府刊本），卷88，〈貴州布政司·黎平府〉，頁15a、〔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7，〈黎平府·風俗〉，頁75、卷7，〈黎平府·形勝〉，頁76。

擔任官職，其著述雖未用府志之名，內容仍為地理志書。另一萬曆《黎平地輿志》的作者何東鳳(1560-1631)，字警谷，號鳴宇，他是黎平五開衛人，為南明忠臣何騰蛟(1592-1649)父親，因後人感念騰蛟殉國忠義追訪家乘，有更多事蹟曝光。¹⁰²相關研究因乾隆《開泰縣志》記何東鳳為萬曆四十五年(1617)歲貢，生平行事主要在萬曆、天啟年間，故尚可推估是志纂於萬曆年間。¹⁰³但稍一比對它地志書，何東鳳在生員時，就參與過萬曆二十五年(1597)成書的《貴州通志》校對。¹⁰⁴萬曆四十年(1612)，他出任衢州府西安縣訓導，並於四十五年(1617)擔任雲南新興州學正，故舊志中的歲貢時間記載定有誤失。¹⁰⁵近人所抄錄的〈明誥封文林郎前新興州學正鳴宇何公墓志銘〉文，也能證實舊志有所疏漏。¹⁰⁶

這裡要特別點出來，受到編修省志工作影響，銅仁知府張錫、思南知府趙恆不僅掛名在萬曆《貴州通志》卷末的姓氏職名，他們也因應當時省志徵集，落實在個人倡導的府志編刊上。就連萬曆二十六年(1598)銅仁進士萬士英，同樣也曾加入省志編校團隊，十餘年後遂被地方官府所倚重，協助編纂

¹⁰² 胡長新編，《忠烈編》，收入《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仕宦卷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同治元年三忠合刻本影印，2010)，卷1，〈何氏世系〉，頁21-22、卷2，〈何文烈公祠記〉，頁163-164。

¹⁰³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456-457。

¹⁰⁴ 〔萬曆〕《貴州通志》，卷24，〈藝文志·專理編校各姓名職名〉，頁650。

¹⁰⁵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啟〕《衢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8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二年刊本影印，1983)，卷3，〈職官志·儒師〉，頁386；任中宜原本，徐正恩續纂，《新興州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雲南府州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影印，2001)第3冊，卷6，〈官師·秩官〉，頁283。

¹⁰⁶ 向正能抄錄，俞成烈標點，〈何公墓誌銘原文〉，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黎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黎平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黎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黎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1987)，頁108-112。

《銅仁府志》。¹⁰⁷考量到萬曆年間黔楚邊界府衛糾紛不止，改制之請不斷，解決爭議欲有所本，會推進黎平志書的編刊；而曾參與編校省志的何東鳳，或被激發、或在眾所期待下，完成了《黎平地輿志》十二卷。

至於崇禎《黎平府志》的說法，過往都依據光緒《黎平府志》錄入崇禎《黎平志》八卷，知府胡宗虞修，因志成不久即毀於兵燹，認定乾隆、道光志書雖均未提及，卻相信有是志。¹⁰⁸可是《順治十二年乙未科會試進士履歷便覽》載胡宗虞(1621-?)，武進人，清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顯見絕無可能在明末任知府。¹⁰⁹胡宗虞於康熙十年(1671)出任安順知府，也與黎平府無涉，所以胡宗虞修崇禎《黎平志》說法不可信。倒是晚明石阡府也有一位胡宗虞，科考副榜。其父允恭，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官至刑部主事，有德於鄉里，父子都為地方名士。¹¹⁰石阡胡宗虞是否參與過黎平地方志書的修纂？可待追考，但暫不列入黔東志書範疇。

同樣運用史源學分析，《大明一統志》、弘治《貴州圖經新志》關於各府紀錄，常出現《郡志》、《府志》，《舊志》、《新志》等摘引書，顯示明初貴州地區的修志數量決不止於此，正由於作者難考，且也可能部分以採訪冊名義提供上級長官修志，故未被各地志書正式紀錄下來。是以本文整理出明代黔東六府的志書刊修情況，發現石阡、銅仁與黎平為最，各有五修。再者為鎮遠府四修、思南府三修，而思州府為二修。(參見附表 1)

¹⁰⁷ [萬曆]《貴州通志》，卷 24，〈藝文志·先後在事各姓名職名〉、〈藝文志·專理編校各姓名職名〉，頁 649-650。

¹⁰⁸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 459、張明，〈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頁 165，以及歸然主編，《貴州地方志提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頁 61。

¹⁰⁹ 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558。

¹¹⁰ [乾隆]《石阡府志》，卷 6，〈學校志·選舉〉，頁 359-360。

附表 1：明代黔東地區六府府志修纂表

時期 府	永樂後期到 天 順 年 間 (1413-1464)	成化到正德年間 (1465-1521)	嘉靖到隆慶年間 (1522-1572)	萬曆年間 (1573-1620)
石 阡 府	一 修 (各 府 知 府 奉 命 修 纂)	二 修 (成 化 十 六 年，知府余志修 纂，卷數不詳)／ 三 修 (成 化 二 十 三 年，知府祁順修 纂，十卷)	四 修 (隆 慶 三 年， 知府呂克修纂， 十三卷)	五 修 (萬 曆 三 十 六 年頃，知府江大鯤 修纂，卷數不詳)
銅 仁 府		二 修 (弘 治 年 間， 郡人盧金纂，卷 數不詳)	三 修 (嘉 靖 四 年， 郡人鄭重纂，六 卷)	四 修 (萬 曆 二 十 四 年，知府張錫修，十 卷)／五 修 (萬 曆 四 十三年，知府陳以 躍主修，郡人萬士 英編纂，十二卷)
黎 平 府		二 修 (成 化 年 間， 教授留讓修纂， 四卷)	三 修 (嘉 靖 年 間， 推 官 馮 天 秩 修 纂，八卷)	四 修 (萬 曆 十 九 年， 知府袁表纂修，九 卷)／五 修 (萬 曆 二 十五年後，郡人何 東鳳纂修，十二卷)
鎮 遠 府		二 修 (弘 治 四 年， 知府周瑛修纂， 八卷)	三 修 (嘉 靖 三 十 二 年，知府程燦修， 訓 導 劉 向 陽 等 纂，八卷)	四 修 (萬 曆 四 十 一 年，知府張守讓纂 修，卷數不詳)
思 南 府			二 修 (嘉 靖 十 五 年，知府洪价修、 教授鍾添纂，郡 人田秋刪訂，八 卷首一卷，嘉靖 二十九年增修)	三 修 (萬 曆 二 十 二 年，知府趙恆主修， 郡人蕭重望纂，十 卷)
思 州 府				二 修 (萬 曆 十 年，知 府蔡懋昭纂修，增 補一卷)

八、僻地修志的動機理念

明初朝廷修志政策雷厲風行，要求各地「文理官員及教官儒士，採取古今事蹟，併新舊書回京」，官員自然不敢怠慢，思州知府崔彥俊隨即編志成書，只是庶務草創，時間緊迫，該志僅有一卷，這或也反映明初貴州八府的情況。¹¹¹透過附表 1，顯示黔東地區的府志修纂，知府的角色相當關鍵，明初多由知府奉命執行，而有明一朝，近八成的志書刊行都由知府來主導。

明朝知府為正四品，總掌一府政事、獄訟、賦役與教化百姓，責任匪淺。然明代中期黔東地區不比大郡，地方偏遠，常被當作謫宦之地，政事治理雖簡，卻猶如流放，當邵珪(1441-1488)被擢任思南知府時，「報者至，人皆歎且惜之」，即表示：「奈何作郡？縱使作郡，奈何置此數千里外？」¹¹²無獨有偶，徐溥(1428-1499)贈給字「文敬」的邵珪序文也提到：「命下之日，人皆以思南遐方，而文敬文士，不宜居。」¹¹³又像是石阡府，時人看法曰：「石阡僻在西南，去京師遠甚，所屬無州縣，惟長官司四，儒學、巡司各一，賦稅、徭役、獄訟、供億俱簡。」又以丁昶(?-1499)進士出身，卻以南京兵部郎中擢陞此地，如同大才小用。¹¹⁴柴奇(1470-1542)則以為「若石阡諸府，亦皆一時建置，大抵以其夷且遠也，人多憚往」，甚至到任官員「率無意於其民，苟簡沮餒，數日冀遷而已」，這種情況，直到正德年間「諸府亦間以進士授之」，重視官員出身任用，才有所改善。¹¹⁵

祁順雖是被貶官來到石阡，欣然接受、隨遇而安，他說：「郡居貴陽荒僻之區，山水幽勝，民稀事簡。官于是者，省奔趨供億之勞，多閑雅優游之

¹¹¹ 〔萬曆〕《黔記》，卷 40，〈宦賢列傳七〉，頁 791。

¹¹² 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文前稿》(長沙：岳麓書社，1985)，卷 6，〈送邵文敬知思南序〉，頁 81。

¹¹³ 徐溥，《謙齋文錄》(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辛卯年看梅花所重刊本)，卷 3，〈送邵員外知思南府序〉，頁 16b。

¹¹⁴ 毛超，《菊菴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明嘉靖十四年吉水毛氏家刊本膠片)，卷 10，〈送丁德輝守石阡序〉，頁 5b。

¹¹⁵ 柴奇，《黼菴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 6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崇禎八年柴胤璧堂修補本影印，1997)，卷 8，〈送同年何宗尹守石阡序〉，頁 110。

適，余心甚安之。」¹¹⁶正因僻遠，「其民朴而少爭，貢賦易完，賓客罕至，吏于是者，無迎送之勞，無催徵之迫，無獄訟之擾」，這讓祁順真切感到「山水爭臨之樂乃兼有焉」。¹¹⁷在閒暇時，觀察到本地「花鳥不殊華夏景，江山猶是異鄉情」，¹¹⁸並將政教理想與詩文，抒發寄託在《石阡府志》內。好友周瑛不僅作序，亦留詩云：「汲書王會今初見，周禮職方舊不同。」¹¹⁹

周瑛，福建莆田人，被調任鎮遠知府，和祁順一見如故，因為「投荒萬里愁無伴，傾蓋片時逢故知」，彼此感同身受。¹²⁰周瑛同樣有修志之意，到任即索故志，他思索：「既亡郡乘，何以稽故實以達諸政？」於是考地理、詢敵情、訪民隱，一切攸關政事者均博求之，「據所聞見，特加考證，以補郡乘之闕」，修成《鎮遠府志》，當中也包含了「一時游賞題詠，皆登載無遺」。¹²¹周瑛的《鎮遠府志》共八卷，被譽為「採摭最備」。¹²²同時還有一位同名同姓的興隆衛人周瑛(1429-1502)也完成《興隆衛志》二卷，興隆衛相鄰鎮遠府，因地緣之便，兩人結識相交，鎮遠知府周瑛題詩：「場屋疑名記昔年，白頭相見兩茫然。」由詩名〈次石阡韻寄興隆周方伯〉顯示兩位周瑛與祁順相互詩詞酬答。¹²³他們撰述志書中的紀錄，不久也都被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所徵引。

到了明代中後期，嘉靖、隆慶年間，黔東地區有五府修志。此時黔東不斷湧入外地移民，人口漸增與土地開發，土客關係日趨緊張惡化，訴訟糾紛與刑名政事更治絲益繁。石阡地區已是「唇齒湖蜀，俗褻夷夏，稍不輯則狼

¹¹⁶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 11，〈送致政曾經府序〉，頁 521。

¹¹⁷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 12，〈宦適軒記〉，頁 532-533。

¹¹⁸ 祁順，《巽川祁先生集》，卷 6，〈石阡春望有懷〉，頁 462。

¹¹⁹ 周瑛，《翠渠摘稿》，卷 7，〈次石阡曉發新添韻〉，頁 860。

¹²⁰ 周瑛，《翠渠摘稿》，卷 7，〈貴藩聘修實錄府衛諸公皆出祖(祁)石阡有作次韻〉，頁 859。

¹²¹ 周瑛，《翠渠摘稿》，卷 1，〈修鎮遠府志序〉，頁 732。

¹²²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 5，〈鎮遠府〉，頁 62。

¹²³ 周瑛，《翠渠摘稿》，卷 7，〈次石阡韻寄興隆周方伯〉，頁 859。

奮驚起，挺刃相擊」。¹²⁴政事「獨苦狡夷為梗」。¹²⁵嘉靖二十一年(1542)還發生「銅、鎮諸苗出擊石阡，地方軍民死者甚眾」，石阡府城被陷掠。¹²⁶故或期許地方官能「分擅聲名遊上國，應將文物變暇方」。¹²⁷

在這個背景之下，嘉靖《思南府志》刊行很具代表性。志書主要的推手知府洪价(1483-1545)，徽州歙縣人，汪道昆(1525-1593)為同鄉洪价寫的墓誌銘說他「尋拜二千石，守思南。故守或以為要荒而鄙之，什五不往」，獨洪价嘆云：「莫非王土，命之守土，將安辭？」單身赴任，亟思親政愛民，「郡故雜夷喜鬥，至則惟化俗為孳孳，廣勵學官，務興文教」，在任內「名宦鄉賢始有祠，郡始有志」。¹²⁸知府洪价和教授鍾添等人倡修的志書中，著重建置沿革，多所反映土著的動向；〈田賦志〉記載廩祿、貢賦、戶口、差役，列有詳細數目，印證朝廷、土司與流官之間的相互關係；〈拾遺志〉提到「弘治以前，川民不入境，大率土廣人稀」，但「弘治以來，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將各空閑土地，招佃安插，據為其業」，日積月累，客勝土弱，「禍亂且起矣」。¹²⁹洪价自己就表示志書「所以紀沿革，著物產，昭鑒戒，非徒以飭吏事、廣人之聞見而已」。¹³⁰

黔東各府兵燹紀錄大多相類，不少文獻稱官員來此地如畏途，多不願往。尤其是思州，「去京師八千里，地僻而小，蠻夷雜處」，一被任命為思州知

¹²⁴ 沈愷，《環溪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 9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印，1997)，卷 23，〈中順大夫石阡守石臚褚公墓表〉，頁 265。

¹²⁵ 鄒元標，《鄒公存真集》，收入《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補編 7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二年特恩堂刻本影印，2005)，卷 7，〈中憲大夫石阡府知府雲麓郭公銘〉，頁 308-309。

¹²⁶ 〔萬曆〕《貴州通志》，卷 17，〈石阡府·紀兵〉，頁 390。

¹²⁷ 王廷幹，《巖潭詩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明嘉靖三十二年代州張定刊本膠片)，卷 9，〈留署稿·送張東潯守石阡〉，頁 55b。

¹²⁸ 汪道昆，胡益民、余國慶點校，予致力審訂，《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 55，〈明故中順大夫思南府知府洪公配恭人王氏合葬墓志銘〉，頁 1162。

¹²⁹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 504-505；洪价修，鍾添纂，田秋刪訂，〔嘉靖〕《思南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 重印)，卷 7，〈拾遺志〉，頁 2a-b。

¹³⁰ 洪价，〈思南府志後序〉，收入〔嘉靖〕《思南府志》。

府，「或者弗滿焉」。¹³¹對當地評稱：「宇內畿省十有五，而貴為最下；貴屬凡八郡，而思為最下。」¹³²嘉靖三十年(1551)，思州知府李允簡(1502-1551)被執殉難，兵戈殺掠擾亂無已。¹³³更加深眾人對當地難治的印象，當順慶府同知王儀鳳(1500-1565)升任思州知府時，順慶百姓以「苗民作梗，曾破城殺人，而舊守李允簡遇害」為由，「多勸君弗就者」。¹³⁴也有人「以繕部大夫出守思州，居怏怏，自謂左遷，殊不欲往」。¹³⁵由此考察，明代思州的志書數量最少，有一段很長的期間無暇顧及志書編刊，當可作此理解。

明政府在黔東地區曾用兵近二十年，許多明中期興起的宗族鄉里與土著村寨都遭到嚴重摧殘，大多成為無人煙的荒村，地方執政官員不得不再次總結當地的統治政策。¹³⁶治理為上，彼時方志的實用價值愈發被重視。嘉靖二十九年(1550)，貴州巡撫李義壯(1488-?)暫駐鎮遠府，「閱郡志，見其散逸遺脫」，命知府程燦(1489-1564)纂述，並聘請也任過貴州巡撫的劉渠(1492-?)任總裁。只因「時銅平師旅，力未暇及」，巡撫李義壯又已卸任。兩年後，戶部主事錢嘉猷(1500-?)奉命清理福建廣東鹽法，他是鎮遠衛人，返鄉之際支持修志，因此程燦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完成了《鎮遠府志》八卷本。¹³⁷在時間上，《貴州通志》正開始議修，貴州地方各級官員均關注志書，不可謂巧合。

¹³¹ 潘希曾，《竹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66冊，卷6，〈送思州太守俞君序〉，頁728。

¹³² 蔡潮，《霞山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據內閣文庫明刊本影印)，卷8，〈思州府重修儒學記〉，頁3a。

¹³³ 歸有光，《歸有光全集》(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卷24，〈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墓碑〉，頁292-293。

¹³⁴ 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閒居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卷7，〈中憲大夫思州府知府梧岡王君墓誌銘〉，頁597。

¹³⁵ 皇甫汈，《皇甫司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75冊，卷44，〈送繕部葉君擢守思州序〉，頁781。

¹³⁶ 高應達，《明清時代改土歸流後黔中少數民族區域社會的變遷：以黔東及黔東北地區宗族為例》，頁34-35。

¹³⁷ [萬曆]《黔記》，卷14，〈藝文志上〉，頁302。

明代中葉以後，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修志風氣更盛，官員對邊境人口的身分認定與分類愈加關心，諸多地理書作品應運而生，創造出所謂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¹³⁸明萬曆年間，黔東六府均有修志，符合潮流，長達百年以上未曾修志的思州府也完成增修。思州知府蔡懋昭(1512-1602)於萬曆九年(1581)到任，在此之前就參與過《浙江通志》、《新河縣志》、《趙州志》、《陽江志》等志書的編修工作，可謂修志能手，他對志書深感興趣，來到思州，「欲尋故實而無從」，多方打聽下，在鄉間民宅發現永樂十五年(1417)舊志抄本，倍感高興，他怕更動舊志會泯滅其創始精神，故特加保留，繼之增補「而別為新志，并鋟梓之，以相參考」。¹³⁹

黎平知府袁表(1536-1593)，閩縣人，字景從，入仕前就在詩壇上大放異彩，為眾所矚目。袁表來到貴州黎平，「黔南為郡臥經時，寂寞閒堦絕訟辭」。¹⁴⁰就像之前的祁順一樣，在政事簡易下，能專心考察黎平府的史志。袁表審視之前的《地里考》、《志夷雜詠》、《黎平五開記》等著述，「皆缺有間矣」，他取各家之長，以全面角度「始作《黎乘》」，共九卷三十三篇，書成於萬曆十九年(1591)。該志得到巡撫郭子章高度的讚揚：「此近日郡志之典者。」湖廣副使林梓(1538-1628)則為該書作序，稱內容：「提緯古今，詳而核；總驗名實，典而約；選言採藻，雅而葩。良哉！」¹⁴¹

晚明黔東六府的志書品質也普遍提升。比如思南知府趙恆，山西樂平人，到任前已有輯志經驗。¹⁴²趙恆修志，「屏私意，黜誹譽，檄往牒，采輿論，讎校刪潤，綱揭而不繁，目詳而不穢，載閱月而成帙」。雖僅一月書成，適逢省城《貴州通志》開局，上級官員「甫按部察郡志考之」，於是地方官員

¹³⁸ Leo K. Sh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0-178.

¹³⁹ [萬曆]《黔記》，卷14，〈藝文志上〉，頁302-303。

¹⁴⁰ 袁表，《逋客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明萬曆十九年趙世芳刊本膠片)，卷4，〈春日郡庭遣興〉，頁17b。

¹⁴¹ [萬曆]《黔記》，卷14，〈藝文志上〉，頁300-301。

¹⁴² 趙恆於萬曆十二年任陝西鞏昌府同知，修過岷州志書。康熙《岷州志》有序云：「岷之有志，自前明武宗朝景寧李公(李樟)為之始。至神宗時，樂平趙公(趙恆)繼而輯之。」引自金恩輝、胡述兆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下冊)》(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6)，陝西頁26。

再詳加訂閱、校正，「合眾見，定公評，歷年所而志成」。¹⁴³修於萬曆四十年(1612)的《鎮遠府志》，則是知府張守讓有鑑於舊志「遭回祿毀，缺而未備，職方有遺考焉」，因而「進掌故取而損益之」，明人何天麟則稱此志「事核文實，例嚴裁當，稱信史矣」。¹⁴⁴時人重視史志體裁的評語，恰好也見於前述的邱禾實〈石阡府志序〉內。

九、邊境輿志與地方事務

明代的黔東地區方志大多佚失，彼時《石阡府志》現均已不存，卻不代表這類書籍完全無用。明人田汝成(1503-1557)擔任過貴州按察司僉事，他長途跋涉來到石阡府巡視，「復按夜郎圖」後，對於當地「嵐氣經年結，緗縑畫卻無」，觸景興懷。¹⁴⁵田汝成所利用的地圖，或為繪苗圖冊，也很可能是收於志書內的繪圖。又如王材(1508-1584)說：「余書生也，即通都大國，風習之所嚮，政教所宜，往往得諸圖史，或旁傳述聽，不必既其寔，余烏能知石阡哉？」為了回應眾人諮詢請益，「則復披輿地之籍」，得以了解其風土民情，據此撰文贈給即將赴任的石阡知府。¹⁴⁶而晚明東莞人徐兆魁(1550-1635)為祁順作傳，傳末指出祁順在石阡的治績，均可見於《石阡府志》內的〈名

¹⁴³ 引自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頁547。但該書提及的撰序者陰容，實為知府陰鎔。

¹⁴⁴ 何天麟，〈郡志跋〉，載於衛既齊修，薛載德等纂，〔康熙〕《貴州通志》，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1輯，《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39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據清康熙三十六年原刊、貴州省圖書館油印本影印，2003)，卷34，〈藝文志·跋〉，頁617。

¹⁴⁵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8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嘉靖四十二年田藝衡刻本印，1997)，卷12，〈書石阡府地圖〉，頁586。

¹⁴⁶ 王材，《念初堂集》，收入《明別集叢刊》(合肥：黃山書社，據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影印，2013)第2輯第79冊，卷8，〈贈石阡太守簡君之任作〉，頁407。

宦傳》。¹⁴⁷顯示志書是當時最易入手的地理知識手冊，也是寶貴的歷史人物資料庫，均能發揮重要的作用。

志書對於人生地不熟的官員幫助甚大，思南知府張烈就寫了一篇〈書思南府志後〉，強調他一聽到新的職務，茫然自失，惕然暗思：「思南，西南邊徼也，何以治？何以訓？」因為「腹裏邊方，風俗則異；土授流除，官屬則異；苗獠土客，人民則異」，這些都讓他一再的徬徨恐懼，究竟能找誰來諮詢？有何指引？全無頭緒。他勉強上任，無意間在官府廳堂內發現志書刊本，且愕且喜，感動不已，還趁著入省城長途遠行的機會，「挈志登輿，置諸式函，往返熟讀而潛玩之」。¹⁴⁸即使是帝國邊陲地區，志書幾乎等於政書，仍不可或缺。

官員或郡人修志，意識到要提升地方文化意蘊，可利用佳景奇境，打造或建構八景等山水名勝，並將古今名流遊覽登眺詩文作品陳列於志書內，以豐富審美、探古和教化效用。不僅石阡府會有八景，就連嘉靖《思南府志》、萬曆《銅仁府志》也都紀錄了地方十景詩詠。¹⁴⁹此後思南府人冉宗聖說：「諸景物志，《郡志》中已十之八矣。」在他看來，「因景會心」、「觸景皆勝」，於是還增詠十八景。¹⁵⁰有趣的是，荒鄉邊地若無特殊景觀、文化底蘊，志書勉強為之附庸風雅，徒然造就反效果。¹⁵¹

¹⁴⁷ 徐兆魁，〈江西布政使巽川祁公傳〉，收入《巽川祁先生集》，頁404。

¹⁴⁸ 張烈，〈書思南府志後〉，收入〔嘉靖〕《思南府志》。戴思哲在他的專著中也剖析過張烈這段志書閱讀經歷，但書中將《思南府志》的編者誤認為田汝成，事實上田汝成只有撰寫該志書序。見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291.

¹⁴⁹ 錢溥，〈思南十景詩序〉，收入〔嘉靖〕《思南府志》，卷1，〈地里志·山川〉，頁21a-b；〔萬曆〕《銅仁府志》，卷1，〈方輿志·形勝〉，頁117-125。

¹⁵⁰ 冉宗聖，〈思南十八景詩序〉，載於夏修恕、周作楫修，蕭琯、何廷熙纂，〔道光〕《思南府續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46》（成都：巴蜀書社，據清道光刻本影印，2006），卷9，〈藝文門·序〉，頁324。

¹⁵¹ 以黔中地區的都勻府為例，晚明徐霞客來到此地，索得志書，覺得「甚略而不詳，即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並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他對「載都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即各地大同小異的做法嗤之以鼻，認為「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見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4下，〈黔遊日記一〉，頁630。

黔東志書多以府志為主，這類層級地方志與晚明以降江南私修鄉鎮志性質大不相同，難以類比。森正夫指出，縣志級以上的地方志，一般是作為王朝國家的地方行政機構事業而被刊行的，會有組織、財政上受保障的一面，問題則在內容上也常受到制約。¹⁵²府志又為官修，其政務教化的內容最被看重。當然在邊境地區也不例外，戴思哲就認為明代邊境地方志的特點，是用中國文化本位立場書寫邊境，無論漢民族或非漢民族地區，地方志對正在發展中的地方傳播文教起了統合作用，更是重要的統治手段。他針對四川馬湖府的情況，論證世襲的土官曾編著地方志，有助其統治的合法化，直至流官到任，即重修志書予以批判。¹⁵³透過連瑞枝的研究，也可發現在明清之際的雲南山鄉，土官企圖鞏固其政治地位，積極爭取地方歷史的話語權，因而陸續編寫山志。¹⁵⁴

在明代貴州，非漢民族菁英同樣關心志書內容，像是萬曆《貴州通志》纂修時，曾有土官「夜持千金，欲有所關說」，遭到纂修者嚴厲回絕。¹⁵⁵在黔東地區，地方志常會記載土官世系、傳記，以及朝廷頒布的恩典證明，正如嘉靖《思南府志》特書擇錄誥敕的用意，就在於「夫世遠或遺，無以永昭天命也」。¹⁵⁶官修志書象徵著公信力，部分家譜為了印證家世背景，會在族人事蹟後註明「府志」，猶如官方為之背書。¹⁵⁷不過我們也得注意到身為土

¹⁵² 森正夫，《「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為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頁63。

¹⁵³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52-62.

¹⁵⁴ 連瑞枝，《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554-558。

¹⁵⁵ 唐樹義等編，關賢柱點校，《黔詩紀略》（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卷11，頁410。

¹⁵⁶ [嘉靖]《思南府志》，卷8，〈誥敕〉，頁546。

¹⁵⁷ 如《任氏族譜》載他們入貴州黎平的始遷祖：「大明洪武間，以征白岩塘功，授湖廣五開衛指揮百戶，入黔始居黎平東廂中所，不亢不卑，有為有守，蹟載《府志》。」任志德纂修，《景印湘黔任氏族譜》（臺北：臺北市任氏宗親會，據清光緒二十年樂安堂本影印，1988），〈延熙次子房系〉，頁6a-b。

著後裔的田秋(1494-1556)，對鄉里事務積極熱心，更關注修志活動，故田汝成說：「田子有功于父母之邦也，志之作，宜首表焉。」¹⁵⁸而田秋在刪定嘉靖《思南府志》時，特意著重本宗族的歷史，載入田氏祖先田祐恭墓碑銘文，另一面又修造家譜，均塑造出來自中原漢族的意象，為土著家族尋找發展政治和經濟新出路。¹⁵⁹

萬曆《銅仁府志》是明代黔東地區最後一部府志，成書約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雖由知府陳以躍掛名主修，但實際撰述者是郡人萬士英，全書常見其議論，並借鑒萬曆《貴州通志》編纂模式，書寫兵防、經濟民生等方面的資料，志書價值甚高。¹⁶⁰萬士英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他和思南府水德江司人田秋來自土著世家的背景完全不同，士英父親萬宗孟(1540-1604)早年自四川舉家搬遷到銅仁，曾在省府擔任吏員，並以上考而除授延慶右衛經歷，萬氏父子都可謂貴州銅仁府的新移民。¹⁶¹萬士英並沒有土著世家的包袱，撰志一視同仁，故「各司土官，誼同司牧，體均畫邑，亦備書之」。¹⁶²萬士英尊重地方鄉賢家族，像是陳珊、徐宰，都為之作傳，甚至連軼聞都著錄。¹⁶³人物入志不僅有銅仁本地人員，也有外來謀生之人，入選者來源廣泛。¹⁶⁴反

¹⁵⁸ 田汝成，〈思南府志序〉，收入〔嘉靖〕《思南府志》，前序頁3a。

¹⁵⁹ 高應達，〈明清時代改土歸流後黔中少數民族區域社會的變遷：以黔東及黔東北地區宗族為例〉，頁96-98。

¹⁶⁰ 高應達，〈萬曆《銅仁府志》文獻價值研究〉，《銅仁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7卷第4期(銅仁，2005.07)，頁34-36；胡振，〈萬曆《銅仁府志》作者考辨及體例與價值探究〉，頁1-4；黃尚文，〈明代貴州珍稀方志萬曆《銅仁府志》版本與價值考論〉，收入《人文世界：區域·傳統·文化》，第7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頁317-325；鞠飛、白俊騫，〈論萬士英的方志思想——以萬曆《銅仁府志》為例〉，《科教文匯(中旬刊)》，總第482期(合肥，2020.01)，頁162-165。

¹⁶¹ 徐穆，〈萬印山先生墓表〉，收入徐承錦編修，《銅仁徐氏先世事略·前編》(編者自印，1939)，〈三世伯祖鍾汝公事略〉，頁7b-9b。

¹⁶² 〔萬曆〕《銅仁府志》，〈銅仁府志凡例〉，頁99。

¹⁶³ 〔萬曆〕《銅仁府志》，卷9，〈人物志·鄉賢〉，頁213、卷9，〈人物志·隱逸〉，頁222。又，該志卷1，〈方輿志·祥異〉，頁128：「萬曆元年秋，鄉官陳珊宅後同仁閣生靈芝，隣人徐宰以之惠珊，珊作短歌謝之：西隣賢者得徐翁，齒近八袞顏如童。古心直道迥拔俗，厚德偏宜瑞物鍾。舍南植桂僅踰歲，桂側生芝人莫識。」這類逸事，應該是好友徐穆所提供。

¹⁶⁴ 鞠飛，〈小議萬曆《銅仁府志》人物志〉，《北方文學》，第2期(哈爾濱，2019.02)，頁241。

倒是對自己的父親，僅記：「原任衛經歷，以子士英貴，封知縣。」¹⁶⁵不若友人徐穆(1565-1624)撰述〈萬印山先生墓表〉來得詳盡，該文未收錄志書，從這裡也可看出其修志客觀公正的一面。¹⁶⁶

不管是土著田秋或是新移民萬士英，他們都認同地方，關心地方事務，將自己所見所聞錄入志書，伸張鄉里主權，以昭後鑒。嘉靖《思南府志》就一再提及四川西陽宣撫司侵占土地，如指責對方募人至山崖疆界處，將交界碑文「鐫去，以杜口實」，以至界限不可辨，此事載入府志，用意在於「以俟欲聞者」。¹⁶⁷又指稱當地龔灘原為「本府水德司所轄，近被四川西陽宣撫司侵占，每縱使吏類征商于此，百孔需索，莫能控訴」，天設地險都為「西陽錢府矣」。¹⁶⁸對府境內的沿河長官司風俗稱：「沿河與西陽鄰，而去府遠，多被侵削，官不得舉其職，人不得聊其生，蓋六邑之最困者也。」寄望「在位之君子」正視問題的嚴重性。¹⁶⁹貴州銅仁府與四川、湖廣接壤，相鄰西陽、邑梅、永順、保靖四土司「周遭環繞」，銅仁府「一縣五司之地，止為楚、蜀諸苗漁獵之場，邇年以來，蠶食殆盡，兵額不足，糧餉不時，官校束手無策，士民呼籲無地」，導致訴訟兵端不已。眼見事態惡化，萬士英特將官員提出的土司改隸提議，以及自己闡述「隸黔之便」的四項議論均錄志書。¹⁷⁰

黔東地區礦產資源富饒，卻也成為利害之淵藪。嘉靖《思南府志》描述境內婺川地方「有砂坑之利，商賈輻輳，人多殷富，善告訐難治，長吏多不

¹⁶⁵ [萬曆]《銅仁府志》，卷7，〈選舉志·貤贈〉，頁189。萬士英原官於河南祥符縣知縣，有研究指出他於萬曆三十二年在第二任上辭官回鄉，未能作出解釋原因。參見胡振，〈萬曆《銅仁府志》作者考辨及體例與價值探究〉，頁2。其實，萬曆三十二年該年父親萬宗孟過世，於是士英辭官返鄉守制。

¹⁶⁶ 徐穆，〈萬印山先生墓表〉，收入徐承錦編修，《銅仁徐氏先世事略·前編》，〈三世伯祖鍾汝公事略〉，頁7b-9b。

¹⁶⁷ [嘉靖]《思南府志》，卷1，〈地里志·山川〉，頁16a。

¹⁶⁸ [嘉靖]《思南府志》，卷1，〈地里志·山川〉，頁20a-b。

¹⁶⁹ [嘉靖]《思南府志》，卷1，〈地里志·風俗〉，頁11a-b。

¹⁷⁰ 倪壯猷，〈四川西邑湖廣永保四司改隸黔中議〉、萬士英，〈四川西平邑石四土司改隸議〉，收入[萬曆]《銅仁府志》，卷10，〈經畧志·興除〉，頁226-228。

能久，必以罪罷去」。¹⁷¹萬曆《銅仁府志》則載當地的金砂、水銀坑場的礦場情形，也提到大萬山長官司境，「萬山，專採砂汞，居人藉為生業」。¹⁷²萬曆《銅仁府志》成書期間，全國開礦運動雖已中止十年之久，然各地的礦稅徵解尚未落幕，引發的效應深遠，爭議輿論紛起，西南疆臣也曾警告在夷地開礦容易啟釁。¹⁷³萬士英本人藉著主客對話方式，撰文抨擊在深山開採得不償失。¹⁷⁴這些攸關國計民生，深為志書編者所重視。又如徭役不均所產生的百姓負擔，編者深惡痛絕，認為當事者要講求變通，設法解決。¹⁷⁵

明清黔東地區不時發生反抗衝突，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等府平均不到八年就有一次戰事。¹⁷⁶地方人士飽受其害，地方志的兵燹紀事亦不絕於書。嘉靖《思南府志》在〈拾遺志〉中，詳細敘述正德年間作亂者相繼而起，「石、思二府地方，大被其毒」，其後土官刻薄為務，土豪數家擁佃民數千戶，各方勢力暴力相向，釀成戰爭巨變。¹⁷⁷萬曆《銅仁府志》則扼要概述當地民族種類，敘寫之後說：「萬曆十年以前，各苗漸漸鼠狗盜竊，民有訴于土官者，官利其財置不問，自後率以為常，剽劫行李，攻打民寨，驅牛馬，攫金帛，其禍愈大，而上(土)官之入愈多，日釀月積，遂至不可禁禦矣。」¹⁷⁸這些紀錄折射出編者對非漢民族的主觀意見。為此，萬曆志始創〈忠義〉一節，以憑弔遭劫遇難人士，並對「婦人子女有能抗志殞身、不畏鋒刃」者，也特書表揚。¹⁷⁹

¹⁷¹ [嘉靖]《思南府志》，卷1，〈地里志·風俗〉，頁11a。

¹⁷² [萬曆]《銅仁府志》，卷2，〈方輿志·風俗〉，頁134；卷3，〈食貨志·金砂水銀坑場附〉，頁147。

¹⁷³ 唐立宗，《坑冶競利——明代礦政、礦盜與地方社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頁214-241。

¹⁷⁴ 萬士英，〈大木丹砂辨〉，收入[萬曆]《銅仁府志》，卷12，〈藝文志·記敘〉，頁252-253。

¹⁷⁵ [嘉靖]《思南府志》，卷3，〈田賦志·差徭〉，頁8a；[萬曆]《銅仁府志》，卷2，〈方輿志·坊鄉〉，頁136、卷3，〈食貨志·貢賦〉，頁145。

¹⁷⁶ 李錦偉、高應達，《明清時期武陵山區經濟與社會發展史論：以黔東地區為中心》，頁70。

¹⁷⁷ [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遺志〉，頁6a-9a。

¹⁷⁸ [萬曆]《銅仁府志》，卷2，〈方輿志·風俗〉，頁133。

¹⁷⁹ [萬曆]《銅仁府志》，〈銅仁府志凡例〉，頁100。

萬士英主纂的府志中，闢〈兵防志〉一卷詳列兵營布防及兵數員額，收錄〈哨守通略〉、〈兵餉通略〉、〈兵變考略〉，以及郡人陳珊、童福的征剿議論，部分涉及的兵防軍事、輿圖資料等，絕非萬士英一人專擅，肯定是官民合作的結果，才能為修志事業提供基礎。¹⁸⁰萬士英主張對「苗」採用強硬手段，「欲使民重遷而地有養，惟去其苗而可已」。¹⁸¹他提出的調停做法是：「時鵬剿，絕勾引，以撲惡苗之焰。裁冗費，祛冗役，以息災傷之衆。禁土司之侵削，嚴市棍之欺騙，以養瘡痍之鄉。」¹⁸²故有研究者認為，萬曆《銅仁府志》給我們留下了有關「苗民」人口及其對明王朝統治形成威脅的紀錄。¹⁸³

誠然，地方社會或會以不同的敘事傳統，來回應中央既定的「邊夷」書寫典範。¹⁸⁴西南地區的歷史書寫，本來就是中原王朝與地方長時段複雜互動關係下的產物，尚待抽絲剝繭反思。¹⁸⁵透過這些明代黔東地區方志文獻，我們也可發現一旦地方人士加入官修志書的行列，不論是土著或漢人新移民，基於對地方所產生的認同感，同樣會藉由志書來訴諸地方公論，志書與官方文書、地方文獻相互參照，並傳達給中央應該更要重視地方權益與士民感受。

¹⁸⁰ [萬曆]《銅仁府志》，卷8，〈兵防志〉，頁191-210。

¹⁸¹ [萬曆]《銅仁府志》，卷2，〈方輿志·風俗·節序附〉，頁133。

¹⁸² [萬曆]《銅仁府志》，卷2，〈方輿志·樓臺·綽楔附〉，頁139。

¹⁸³ 高應達，《明清時代改土歸流後黔中少數民族區域社會的變遷：以黔東及黔東北地區宗族為例》，頁55。

¹⁸⁴ 連瑞枝，《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頁119。

¹⁸⁵ 謝曉暉，〈西南民族地區的歷史書寫與歷史——基於湘西地區的一點反思〉，收入鍾焯主編，《新史學(第十三卷)——歷史的統一性和多元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81-98。

十、結語

綜觀明代《石阡府志》，以往學界對於當地修志次數的看法分歧，有的認知是僅修一次，即祁順主修的成化志一部。或是主張曾修過永樂志、成化志、隆慶志共三次。經過本文的考訂，論證石阡地區在永樂朝修過一部，成化朝修過兩部，隆慶朝一部，萬曆朝一部，合計明代總共五修，這在黔東地區各府的志書纂修表現上相當突出。明代志書長期發揮一定的作用，清初當地耆老即云：「自明之《一統志》成，而《阡志》備矣。歷二百年餘，人莫不家珍戶襲，各有一冊，以為居今稽古之用，至崇禎末葉而志亡。」¹⁸⁶

過去對石阡志書認識錯誤的印象，是文獻分散難徵所造成的，到了清末，就有地方官表示：「石阡府設自勝朝永樂間，終明之世，未聞有志。」¹⁸⁷故從明中期「郡昔有志，失之太略」，到「終明之世，未聞有志」。石阡的地方官修志動機不一，早期恪守貫徹朝廷意志，地方知府常會和教授聯合編纂志書。卻也可能過於倉促，有失簡略，以致後任官員稽考不易。在明代中期，石阡地區政事易理，有志難伸者到此，修志即成為政務外的另一寄託。不論是余志或是祁順，他們都是謫貶來到黔東僻地，就如祁順所云「俗客不來公事簡，倚窗頻和白雲篇」、¹⁸⁸或是「僻郡蕭條鄉信疏，自甘寥落守寒株」所流露出的寂寥逸致。¹⁸⁹透過修志，余志、祁順等人持續推動教化，所以成化志反映個人政績成就，補入詩文作品，希冀流芳後世。到了明代中後期，地方志書重視體例、史法與文徵，卷數類目增加，附上地圖，井井有條，重視地方望族，增入誥敕文本，是隆慶志的特色。而萬曆志不僅體例次第合適，並強化兵事、忠烈人物等記事，應與時事脈動相關。

明代石阡修志是黔東地區的縮影，知府官員依賴志書，也投入志書編修，官修志書是為主流。其後黔東士子輩出，漸能參與本地志書工作。比如田秋

¹⁸⁶ 彭可謙，〈石阡府志敘〉，收入羅文思纂修，〔乾隆〕《石阡府志》，頁294。

¹⁸⁷ 方齊壽，〈重修府志序〉，載於邱任偉等纂修，〔光緒〕《石阡府志》，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1輯，《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46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年刊本影印，2003），頁3。

¹⁸⁸ 祁順，《巽川祁先生文集》，卷5，〈石阡述懷〉，頁453。

¹⁸⁹ 祁順，《巽川祁先生文集》，卷5，〈遺興〉，頁454。

投入嘉靖《思南府志》的刪改工作，蕭重望重輯萬曆《思南府志》，以及萬士英主撰萬曆《銅仁府志》。最有意思的是，其後思南府蕭重望的曾孫蕭嗣昌參與過康熙志編修，到了清道光年間，郡人蕭瑄加入了修志團隊，而他也是蕭家的後代，在後記中特地表述這段奇妙淵源，宣稱：「良非偶然，撮其大略，以俟後之君子」。¹⁹⁰

顧炎武(1613-1682)對明人修志有過批評，認為志書有四不可作：一、「不讀其人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二、「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三、「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四、「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他指出今人多未通曉就妄為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是以牴牾不合。¹⁹¹雖是如此，無論是出自政務需要，或是出於獵奇心態，倘若帝國西南邊陲缺乏有志之士的留心紀錄，就難以豐富以及互參互證出一個「西南知識系統」。¹⁹²透過前人對清代貴州的統治觀察，也證實當地志書大幅增加族群敘述與分類的編纂工作，是在晚明開始出現。¹⁹³倒是顧炎武提出的官員修志警語，更提醒了乾隆《石阡府志》的作者「考據必得其詳，論斷必求其實」，將修志警語當作座右銘，小心翼翼撰述本地志書。¹⁹⁴

當然，比起先進開發地區，貴州石阡修志成果仍然有限。例如明代蘇州府的府志編修就多達十一次，又如揚州、池州、徽州、常州、淮安等府志也有七修或六修，然則南直隸的安慶府、寧國府卻也僅三修。¹⁹⁵相較之下，貴州長期被置於國家典藏地理書目的最後一隅，卻有一定數量的志書，在在突

¹⁹⁰ 蕭瑄，〈跋〉，收入〔道光〕《思南府續志》，卷12，頁432。

¹⁹¹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長沙：岳麓書社，1994），卷19，〈誌狀不可妄作〉，頁691。

¹⁹²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179。

¹⁹³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27-157.

¹⁹⁴ 羅文思，〈石阡府志自敘〉，收入羅文思纂修，〔乾隆〕《石阡府志》，頁291。

¹⁹⁵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頁75。

顯石阡等地志書的刊行已難得可貴。總之，從明代石阡、銅仁、黎平各府都有五修志書的情況，而非過去僅知三修的數量論之，揭示當時在官府行政的強力推動下，仍有著不容小覷的成就，可見明代貴州佚志數量還值得再作評估，連帶也須再重新檢視志書纂修者、志書閱讀者及其影響面，解決這方面的疑點，有助益我們對地方文獻的深度理解。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傳統史料

- 毛超，《菊菴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明嘉靖十四年吉水毛氏家刊本膠片。
- 毛黼亭纂修，《蕭山毛氏宗譜》，美國猶他州學會，據清道光二十六刊本攝影。
- 王耒賢、許一德纂修，〔萬曆〕《貴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
- 王廷幹，《巖潭詩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明嘉靖三十二年代州張定刊本膠片。
- 王材，《念初堂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2輯第79冊，合肥：黃山書社，據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影印，2013。
- 丘禾實，《循陔園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8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嘉靖四十二年田藝衡刻本印，1997。
- 任中宜原本，〔清〕徐正恩續纂，《新興州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雲南府州縣志》第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影印，2001。
- 任志德纂修，《景印湘黔任氏族譜》，臺北：臺北市任氏宗親會，據清光緒二十年樂安堂本影印，1988。
- 江上錦編輯，《新安東關繼陽江氏宗譜》，美國猶他州學會，據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攝影。
- 江大鯤、林涇等修，《福建運司志》，收入《玄覽堂叢書·初輯10-11》，臺北：正中書局，據明萬曆癸丑刊本重印，1981。

- 何孟倫輯，〔嘉靖〕《建寧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38，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
- 余懋孳，《黃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99》，濟南：齊魯書社，據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影印，2001。
- 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第二卷)》，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李開先著，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 李賢等修，萬安等纂，《大明一統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天順五年內府刊本。
- 汪道昆，胡益民、余國慶點校，予致力審訂，《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 沈庠修，趙瓚纂，〔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 199，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刻本、配明鈔本影印，2006。
- 沈愷，《環溪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9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印。
- 周瑛，《翠渠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啟〕《衢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8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二年刊本影印，1983。
- 祁順，《巽川祁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 3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清康熙二年在茲堂刻本影印，1997。
- 邱任偉等纂修，〔光緒〕《石阡府志》，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 1 輯，《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 46 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年刊本影印，2003。
- 洪价修，鍾添纂，田秋刪訂，〔嘉靖〕《思南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 重印。
- 皇甫汈，《皇甫司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胡長新編，《忠烈編》，收入《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仕宦卷 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同治元年三忠合刻本影印，2010。
- 唐樹義等編，關賢柱點校，《黔詩紀略》，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 夏修恕、周作楫修，蕭琯、何廷熙纂，〔道光〕《思南府續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46冊，成都：巴蜀書社，據清道光刻本影印，2006。
- 徐鑣，〈《月峰先生居業次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萬曆四十年呂胤筠刻本影印，2000。
- 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徐承錦編修，《銅仁徐氏先世事略·前編》，編者自印，1939。
- 徐溥，〈《謙齋文錄》〉，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辛卯年看梅花所重刊本。
- 柴奇，〈《黼菴遺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6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崇禎八年柴胤璧堂修補本影印，1997。
- 袁表，〈《逋客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明萬曆十九年趙世芳刊本膠片。
- 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5刷。
- 莫旦纂，〔弘治〕《吳江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4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弘治元年刊本影印，1983。
- 郭子章撰，郭子仁編，《青螺公遺書》，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冠朝三樂堂刊本。
- 郭子章著，〈《黔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4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陳文等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
- 陳以躍主修，萬士英主撰，〔萬曆〕《銅仁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後期刻本影印，1992。
- 陳循等撰，〈《寰宇通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景泰年間內府刊初印本。
- 陳獻章，孫通海點校，《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 黃虞稷，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楊士奇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鄒元標，《鄒公存真集》，收入《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補編 7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二年特恩堂刻本影印，2005。

劉吉等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

劉球，《兩谿文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1 輯第 38 冊，合肥：黃山書社，據明成化六年劉鉞刻本影印，2013。

潘希曾，《竹潤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蔡潮，《霞山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據明刊本影印。

衛既齊修，薛載德等纂，〔康熙〕《貴州通志》，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 1 輯《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 39 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據清康熙三十六年原刊、貴州省圖書館油印本影印，2003。

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2005。

鮑應鰲，《瑞芝山房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41》，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崇禎刻本影印，2000。

謝東山、張道纂修，〔嘉靖〕《貴州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 19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影印，1996。

歸有光，《歸有光全集》，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羅文思纂修，〔乾隆〕《石阡府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貴州府州縣志》第 1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據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影印，2001。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長沙：岳麓書社，1994。

顧秉謙等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據紅格鈔本影印，1966。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龔勉，《尚友堂文集》，東京：高橋寫真會社，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十九年刊本影印，1977。

(二)近人論著

山根幸夫，《日本現存明代地方志目錄》，東京：明代史研究室，1962。

山根幸夫，《日本現存明代地方志傳記索引稿》，東京：明代史研究室，1964。

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文獻》，總第 37 期(北京，1988.07)，頁 152-162。

巴兆祥，〈明代佚志述略〉，《文獻》，總第 46 期(北京，1990.10)，頁 126-135、61。

巴兆祥，〈論明代的方志數量與修志制度——兼答張升《明代地方志質疑》〉，《中國地方志》，第 4 期(北京，2004.04)，頁 45-51。

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王叔武，《雲南古佚書鈔(增訂本)》，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王雨容，《明清黔東南書院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7。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統計表〉，《史學年報》，第 1 卷第 4 期(北平，1932.06)，頁 171-173。

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向正能抄錄，俞成烈標點，〈何公墓誌銘原文〉，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黎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黎平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黎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黎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1987，頁 108-112。

吳春宏，〈明清時期黔楚邊境的府衛糾紛——以黎平府與五開衛為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6 卷第 2 期(西安，2011.04)，頁 32-43。

吳德義，〈明代存佚省志的數量與時空分布〉，《西北師大學報》，第 55 卷第 4 期(蘭州，2018.07)，頁 82-90。

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 李錦偉、高應達，《明清時期武陵山區經濟與社會發展史論：以黔東地區為中心》，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 林平、張紀亮編纂，《明代方志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林麗月，〈從吳江到新昌——莫旦(1429-1510s)與明代前期的方志纂修〉，收入李金強、郭嘉輝，《從明清到近代——史料與課題》，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73-91。
- 金恩輝、胡述兆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下冊)》，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6。
- 胡振，〈萬曆《銅仁府志》作者考辨及體例與價值探究〉，《懷化學院學報》，第 35 卷第 3 期(懷仁，2016.03)，頁 1-4。
-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 唐立宗，《坑冶競利——明代礦政、礦盜與地方社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
- 高應達，〈萬曆《銅仁府志》文獻價值研究〉，《銅仁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7 卷第 4 期(銅仁，2005.07)，頁 34-36。
- 高應達，《明清時代改土歸流後黔中少數民族區域社會的變遷：以黔東及黔東北地區宗族為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 張升，〈明代方志數質疑〉，《中國地方志》，第 3 期(北京，2000.03)，頁 64-67。
- 張明，〈貴州歷代地方志大事編年表〉，收入《人文世界：區域·傳統·文化》，第 7 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頁 159-182。
-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 張英聘，〈現存明代貴州省志編修簡述〉，《史志學刊》，總第 24 期(太原，2018.12)，頁 55-61。
- 張萍，《明代餘姚呂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 張新民《貴州地方志考稿》，Gent: State University Ghent, Dept. East-Asia Sec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92.
- 張新民，〈明代貴州方志數量辨誤〉，《文獻》，總第 59 期(北京，1994.01)，頁 173。

- 張新民，〈大一統衝動與地方文化意識的覺醒——明代貴州方志成就探析〉，《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北京，2002.11)，頁 35-43。
- 張新民，〈地方性知識的文本世界——貴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論〉，《貴州民族研究》，第 2 期(貴陽，2007.04)，頁 163-175。
- 張新民，〈萬曆《銅仁府志》點校本序〉，《西南古籍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頁 99-101。
- 張聞玉，〈《貴州地方志考稿》評介〉，《中國地方志》，第 5 期(北京，1994.10)，頁 63-66。
- 連瑞枝，《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 森正夫，《「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為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 黃尚文，〈明代貴州珍稀方志萬曆《銅仁府志》版本與價值考論〉，收入《人文世界：區域·傳統·文化》，第 7 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頁 317-325。
- 溫建明，〈祁順及其《巽川祁先生文集》研究〉，《東莞理工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4 期(東莞，2013.08)，頁 9-13。
- 寧南左侯繪，《明代歷史行政地圖冊》，編者自印出版，2018。
- 廖肇亨，〈明代朝鮮詔使詩世界觀探析：以祁順為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218 期(成都，2018.11)，頁 166-174。
- 鄭克強總主編，易平主編，《贛文化通典·方志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 戴思哲，〈明代大學士李本為什麼退休後改姓呂——呂府與呂家史〉，《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0 卷(天津，2009.10)，頁 57-64。
- 鞠飛，〈小議萬曆《銅仁府志》人物志〉，《北方文學》，第 2 期(哈爾濱，2019.02)，頁 241-242。

鞠飛、白俊騫，〈論萬士英的方志思想——以萬曆《銅仁府志》為例〉，《科教文匯(中旬刊)》，總第 482 期(合肥，2020.01)，頁 162-165。

謝曉暉，〈西南民族地區的歷史書寫與歷史——基於湘西地區的一點反思〉，收入鍾焯主編，《新史學(第十三卷)——歷史的統一性和多元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81-98。

歸然主編，《貴州地方志提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

Byon, Jae-Hyon. *Local Gazetteers of Southwest China: A Handbook*.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9.

Dennis, Joseph R.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Shin, Leo K.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Compilers: The Case of Shiqian Prefecture of Ming Eastern Guizhou

Tang, Li-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umber of local gazetteers that were actually compiled in Shiqian Prefecture of eastern Guizho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reconstructs the process of their compilation. Shiqian Prefecture was among the six oldest prefectures of eastern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Most of the local gazetteers of these prefectures have not survived, and historians have not even been able to reach a general consensus as to the history of local gazetteer compilation. For instance, with regard to Shiqian Prefecture, some argue that only one local gazetteer was compiled, i.e., the one compiled in the Chenghua era; others argue that there were three: one each in the Yongle, Chenghua and Longqing eras. Through careful examin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were in fact five Shiqian gazetteers in the Ming dynasty: one in the Yongle era, two in the Chenghua era, one in the Longqing era and one in the Wanli era. The number of prefectural gazetteers in Shiqian was therefore the same as for Tongren and Liping Prefectures.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sheds new light on the compilers of the gazetteers who were otherwise little known. To many officials, appointment to eastern Guizhou was

equivalent to demotion to a remote and desolate corner of the dynasty. Therefore, as if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career setback and frustration, and to leave a positive record of their good governance, some local officials in eastern Guizhou became unusually and highly devoted to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gazetteers. Consequently, content of the local gazetteers in eastern Guizhou expanded and the editorship improved.

Keywords: Ming Dynasty, Guizhou, Shiqian Prefecture, Local Gazetteers